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黄如论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徐启源	高 翔	
理 事	张苏飞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张苏飞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8 期 2017 年第 1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方 薇	
装帧设计	杨 雪			
封面摄影	伊 人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閩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乡情悠远

P7



鼓岭神奇

P30

弦歌犹响起魁岐
——福建协和大学百年祭



世味流年

4 谢冕 乡情悠远

福地风采

7 韩小蕙 鼓岭神奇

14 王剑冰 鼓岭的回声

18 古 耜 那一片清风薄雾里有痛更有爱

24 邱泰斌 古厝人家

闽都记忆

30 伍明春 弦歌犹响起魁岐
——福建协和大学百年祭

36 张无际 闽江边，伫立起一所大学

40 池志海 协和大学寻踪

榕垣旧事

44 李海涛 最后的北洋军团

49 郑 芳 以茶为业的洪氏家族

双塔视野

55 金麦子 镇海楼：时间之外，无人能为你加冕

Contents

P72



金鸡山下地藏寺

P79



象园木雕，树与根的灵性

P94

陈太尉宫：信仰的坐标



- 62 余 暇 铸龙高士
- 69 胡 适 与高梦旦先生的一段交往

闽僧闽刹

- 72 孙源智 金鸡山下地藏寺

艺术档案

- 79 黄锦萍 象园木雕，树与根的灵性

左海风流

- 84 郑黎明 黄榦：朱熹理学第一传人
- 88 张健初 黄榦，安庆的“城市之父”

轶事考辨

- 91 余 臻 谢肇淛与《五杂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 94 郑秀杰 陈太尉宫：信仰的坐标

- 封二 林致贵 榕城处处春如画

- 封三 雨 山（国画） 故乡桃花开
- 陆 地（诗） 父 亲

乡情悠远

谢冕

这是我曾经的天地田园，多梦而多幻想的少年在这里成长。一座赭色带廊檐的木结构连排房子，两层楼，我家住的是其中一个单元。我在楼上朝北的一个小房间做功课，也做梦。在这个小房间里，我享受着家的温馨，也享受着时局的艰难。从我的窗棂向外望去，三角梅编织的篱笆外，是一条弯曲的窄道，这窄道通往林徽因住过的马厂街。我家的正门对着雪庐，那是一家富商自建的几进带橘园的豪宅。幼时我不解，基本无雪的、气候温暖的福州，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寒冷

的名字？那家姓程，户主程大鹏，有专门车夫的黄包车供他进出，是个有钱人家。后来读了些书，知道这雪庐是“程门立雪”的意思，还是很风雅的。

我家的地名是马厂前，是一条较之马厂街更窄、也更短的道路。一条马厂街，一条马厂前，为什么都是马厂？这里一定有一个养马的叫作马厂的地方，我猜想。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上学的三一学校边上的赛马场，即通常我们叫作跑马场的地方。这应该是对的，因为马厂街也好，马厂



前也好，距离跑马场都不远。福州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使领馆和商人、宗教人士涌进来，带来了西方文化，其中包括赛马。我家附近旧时应该有过专门养马的马厂。

那个跑马场，就在三一学校边上，它不设边墙，也不卖票，可以自由进出，却是我们课外常去玩耍的地方，它成了三一学校设在校园外面的一座特大的操场。跑马场一望无际的绿茵，两道碧水环绕着，画了一个同心圆。水是清碧的，岸边水草杂生，长着芦苇和水芹，草坪一劲地向着田野铺开，河岸上稀疏地矗立着秀美挺拔的柠檬桉。柠檬桉总在清晨或傍晚送来迷人的香气。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时局动荡的艰难时节，风雨飘摇中，外国人大都撤离，少数留下的也无心娱乐跑马了。那片绿茵于是荒芜。先是改称林森公园，嗣后新中国成立，又改称人民公园。但我们仍依旧名：永远是美丽的“跑马场”。20世纪80年代我回家乡，公园之名犹在，只是旧时的风雅已荡然无存！

福州家乡，特别是南台一带，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永不褪色的旧时的美丽。还是回到开头说的马厂前吧，20世纪80年代，马厂前还在，母亲洗衣淘米的三口井还在。乡俗，三口井并排，顺序为饮用水、淘米洗菜水、洗衣水，大家都恪守乡约，爱护水源。记忆



1890年福州跑马场赛马裁判台

中母亲在井边浣洗衣服，一边和邻里闲话家常，此情此景，如在目前。龙眼花静静飘落，午休的耕牛在静静反刍，岁月在静静无声地流逝。

我小学上的是仓山中心小学，小学建在田野边上。那里有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座小庙，在那里我遇见我的李兆雄老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爱心温暖了我贫穷而凄寒的童年。那时的户口本上写的地名是程埔头，程埔头是半城半乡的一个社区。从这里穿越一个稻花飘香的田野，就上了公园路，公园路上的三一学校，就是我初中和高中求学的地方。一座尖顶的教堂，彩色玻璃映衬着华丽的宗教画，唱诗班的歌声随着风琴的弹奏，把圣颂优雅地传出来。我当年不信教，但却神往那种神圣和高雅的氛围。学校是爱尔兰（当年称英国，爱尔兰尚未独立）传教士办的，她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却不勉强学生信教。



三一学校林荫道

三一学校校园优美，夹道是遮蔽天日的香樟。一座钟楼，一个校工按时敲钟，如同我们如今在剑桥或是欧洲小镇所听到的。我上学的时候，陈景润也在校中，他高我一班，我们互不认识。如今学校立有他的雕像。只是，那教堂消失了，教堂原址办了校办工厂，破败，荒废，后来干脆铲平了盖房。于是，那些透过阳光的画和音乐，也成了永远不再的风景。

南台岛是一座琼花玉岛，闽江和乌龙江合抱的一颗明珠。这里的风情是独特的，若说福州老城的三坊七巷体现了传统的闽都古典韵味，南台岛所展现的则是陌生的欧陆风情。五口通商使福州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到处是欧式的花园房舍、医院、学校（男校和女校，以及女子大学）、教堂、俱乐部、西餐馆、电影院，还有前面提到的跑马场，整个的西方文明在南中国的艳阳下熠熠闪光。行走在马厂街、对湖路、乐群路，在夹岸的棕榈和三角梅的映衬下，我们仿佛是行走在欧陆的某一处市镇。

记得当年，我放学回家，总是有意地绕道麦顶，鲁贻图书馆边上有一家书店，那里售上海和香港出版的新书，穷学生，买不起书，只能在那里“蹭”读。但每期的《中国新诗》是必买的，不管多贵。辛笛的《手掌集》也是在那里买的，也不便宜。星期日，我可以在鲁贻图书馆泡上大半天。从麦顶出来顺道到乐群路，那里有外国人开的文化用品店，记得那些精美的圣诞贺卡，镶了金边的一品红，是那样地招人欢喜。

梅坞那时已是一个居民区，拾级而上的街道，两旁是居家和商铺，当年这里应当是烟台山边的一条山道，夹岸都是梅花，故有梅坞之称。我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的家就在“梅坞顶”，想当年，那里一定是一个香雪海。我没有看到梅林如海的壮观景象，但我小时家背后的梅花山还在，闽都冬季，皓月在天，梅花迎寒而放，疏影横斜，此情尚在万般忆念之中。

鼓岭神奇

韩小蕙

“神”这个字在我的家乡话北京话中，是一种有着水波涟漪般丰富外延的存在——往往，一个人或一件事，达到了极致，不好用语言来描绘了，便会去找到这个“神”字，做一切表达的挡箭牌，比如，“那个人太神了”，或者“这事儿真神”。

我的初识福建福州的鼓岭，就迎头撞上了好几个“神”。

—

初冬的福州在我们北方人眼里，根本就毫无“冬”的任何元素，粉的、黄的、紫的、白的各种大花小朵，甚至桂花，都还在盛开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草叶、树叶，也依然叶片肥厚，青翠欲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空气透明得老想伸手去摸一摸，吮到嘴里，带有丝丝缕缕的甜，使我那饱受雾霾浸泡的肺，激动得老想要大哭一场！

直到汽车已“嘎”地停在灯光明亮的宾馆门前，直到拖着行李箱爬到三楼，直到打开房门迈步进去，我还一直沉浸在这高浓的负氧离子盛宴中。全没思想准备，旁边的房门打开了，竟然走出了一位富富态态的金发碧眼！

艾伦有50多岁样子，穿着一件暗红色大毛衣，短发，圆脸，杏核一样的大眼睛里，碧蓝地汪着一波笑意。她竟然用纯正的普通话说：“我是艾伦”，其流利程度就像我的任何一位北京邻居，只闻其声不看其人的话，你简直不相信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落座后，她立即以美国人的办事速度，指着电脑里的一张照片呵呵笑着说：“这是我丈夫。”

我又被吓了一跳。只见照片中，一位中国劳动妇女挑着两个大箩筐，正平静地凝视着我们。她有30多岁样子，梳着光溜溜的发髻，上身穿一件洁白的长到大腿根儿的大襟衫，下面身着一双黑裤，整洁，干净，文明，却赤着一双天足。



竹篮中的艾伦丈夫

望着这张拍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照片，我若有所思地对艾伦说：“这说明她的经济情况还是很困窘的，不然走山路不会打赤脚。可是你看她的面色多么平静，一副洁身自好的样子，有着自尊自爱的内心……”

艾伦提醒说：“你看到我丈夫了吗？他在箩筐里呀。”

我这才想起她要说的是她的夫君。但见，一只大筐里睡着一个小婴儿，也就 1 岁左右的样子；另一只筐里放着一些杂物。

艾伦说：“我丈夫穆彼得，1948 年出生在鼓岭。他的父亲、我的公公穆霭仁先生，1939 年第一次来中国，在福州洋口的英华学院教高中，当时他只有 19 岁。一年后他回美国拿学位，后来又于 1944 年回到中国，参加了飞虎队，在云南参加你们的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去美国。你看，这就是他……”

于是，在艾伦的第二张照片里，我看到一

个又高又瘦又帅的美国白人青年，手里倒拎着一只全身黑毛的母鸡，正走在乡间小道上，背后是苍茫的大山。艾伦解释说：“那天，穆霭仁先生的医生朋友给一位中国农民做手术，血不够用了，而且他是特殊的血型，比熊猫血还稀少的一种血。医生朋友知道穆先生是这种血型，就叫他翻山越岭去输血。结果呢，把那农民救活了，他的家人非常感激，就送这只母鸡给穆先生补补身子……”

我听了，胸膛开始剧烈地起伏：真想不到，七八十年前的鼓岭，竟然还演绎过这样温暖的故事！一个美国帅哥的鲜血，竟然还灌注到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身体里，救活了他的命！不是亲耳听到这个讲述，亲眼见到这张照片，简直想破天也想象不到啊——真的是太神啦！



年轻时的穆霭仁医生

艾伦却一点儿也没变色，依然平静地讲述着：“当年，彼得和他爸爸、妈妈，在鼓岭，就住在加德纳先生家里……”

等等！加德纳？这名字怎么好像在哪儿听到过？哦，对了，这不是2012年访美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给美国人讲到的那个故事吗？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加德纳！

二

那个感动人的故事是这样的：

19世纪后半叶，福州五口通商后，许多外国人来到福州，有商人、传教士，也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作家、记者、学者、医生、职员……据说有多达二三十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小小福州，操着各国口音的“洋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福州的夏天特别长，酷热难熬，就像整日泡在雾气蒸腾的澡堂子里，不仅大汗淋漓，身上还会起疹子、长各种莫名其妙的大包小包，甚至染上疟疾、霍乱等传染病……那时又没有空调，似乎连电风扇也是稀罕物。某日，一位叫伍丁的洋医生穿越山岭去给病人治病，发现那座叫“鼓岭”的山上满目青翠，且有阵阵清风吹过，非常凉快，他回去后即在洋人界发布了此消息。于是，金发碧眼们开始一窝蜂地在鼓岭上建夏日避暑别墅……时间风一般地吹过，不过几十年间，洋人们就把鼓岭“承包”了，最盛时居然建起300多幢风格各异的洋房，住进了300多个家庭，

达3000多口人之盛。

密尔顿·加德纳(1901～1986)是美国物理学家，出生在中国，童年在鼓岭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1911年随父母回美国求学，最终成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1969年，加德纳在68岁上退休，越来越怀念中国，特别是心心念念想回到鼓岭“那个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重温他青少年时期的温馨。但时值中国“文革”，福州那边的教堂已全部被红卫兵砸光，且对美帝国主义充满了仇恨，西方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加德纳只好心驰神往地念叨着他的“古——丽——亚”（福州话“鼓岭”的发音）。1972年他突因脑溢血而导致半身不遂，1986年他的病情恶化，直到弥留之际，他一直都在喃喃着：“古——丽——亚……古——丽——亚……”

加德纳夫人伊丽莎白女士，眼含热泪送走夫君。她一直想替丈夫去中国还愿，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之后。但她查了很多资料，始终没查到“古丽亚”是在什么地方。一天，有一位叫钟翰的中国留学生到家里做客，加德纳夫人取出丈夫的一些中国遗物，又向钟翰询问起“古丽亚”。只见其中一张发黄的作业纸上，贴着11枚邮票，钟翰认出了盖在其上的邮戳，有着“福州·鼓岭——Kul-Ing”字样；其中最清晰的一张，还印有时间“三年六月初一日”，这说的就是清宣统三年，刚好是公元1911年呀！踏破铁鞋，难题迎刃而解，加德纳的“古丽亚”终于找到了！

鼓岭是福州郊区的一座山，距福州只有13公里。就在今天，山上还有着十几幢当年洋人建的避暑别墅；甚至连当年的夏季邮局、万国公益社、百年游泳池等等建筑，也还好端端站在山上。加德纳夫人得悉这些后，激动得掉下热泪，她终于可以告慰亡夫：“古丽亚”找到啦！

钟翰同学被加德纳夫妇对中国的友好情谊所深深打动，写了一篇《啊，鼓岭》的散文，在1992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出。谁也没想到，这篇小文章竟被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读到了，于是，在时隔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中美两国普通人民的友谊之歌又被续唱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向加德纳夫人发出邀请，请她来福州、来鼓岭，看看加德纳先生的中国老家。伊丽莎白女士带着先生当年的一批遗物，包括他当年和中国小伙伴玩耍的照片，来到了鼓岭。并且，居然还真找到了当时尚且健在的9位小伙伴！最“神”的是——当年那位女挑夫也还在人世！亲人相见，红了双眼，热了泪水，十指相扣情依依，天风海涛话不完哪……

最为重要的是、为福州人民和鼓岭百姓自豪的是，从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里，埋下了鼓岭的山山水水，记住了鼓岭的包容与大气。乃至在离开鼓岭多年之后，在登上了中国国家政治舞台之后，在访美行程中的讲话里，他脱口就讲出了加德纳的故事。据说，当时在场的美国嘉宾们，包括著名的基辛格博士，都被感动得动了容。

三

现在，我要重新说回到彼得、艾伦夫妇了。

就在我与艾伦在鼓岭漏夜长谈的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艾伦就跟着一行人出发了，这里面有鼓岭的父母官，还有地域专家、民俗专家、非遗专家、建筑师、记者……这一天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他们是要确定当年加德纳故居的确切位置。

1911年，加德纳一家回美国前，将他们在鼓岭上修筑的房子，卖给了一位叫Coolle的先生。后来，穆霭仁夫妇曾带着刚出生的小彼得（即女挑夫箩筐中的小婴儿），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一个夏天。

也就是说，加德纳故居，即穆霭仁故居，亦即穆彼得故居。此前以讹传讹，大家都以为的一座建筑是加德纳当年的家，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已对那老房子进行了修缮，并开辟为加德纳纪念馆。

重新考证加德纳故居位置，缘起于宜夏别墅悬挂的一张照片。

由于台风、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等自然灾害，也由于时间和空间均非永恒不变的神祇，所以几十年上百年间，鼓岭上的洋别墅倒的倒，毁的毁，现存于世的仅有十几幢了。宜夏别墅是其中保存得最好的一幢。它的风格与老照片上的其他洋建筑们大体相当，都是灰色石块外墙（石块皆取自当地），白色木质百叶窗，大门外有一个

带木顶的大阳台，摆一些桌椅，是喝下午茶的所在。从外表看，这些房子貌不惊人，甚至可以说是很朴素的，然而推门走进去，一下子就感觉到非常“洋气”：房间高大、宽敞，每间房子都像一座小礼堂似的。百年木地板“吱呀，吱呀”地显示着岁月的承重力，欧式壁炉还张着大嘴准备随时启用。家具虽然简单，但雕花大立柜、木箱和高靠背椅，还有铜制的烛台，一望而知就是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漂亮而精致的瓷器，盘、碗、小摆件等等，白白亮亮的，也极有英伦范

儿，是的，美国文化的滥觞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形成的英格兰……

而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墙上悬挂的众多老照片。不知谁这么伟大，居然把几十张老照片都保留下来了，使我们得以准确地获知昨天的生命形态，和在重重历史迷雾之下被遮蔽的真人、真事、真生活！照片上的洋人们，都已是百年前的装束了，可是女人们那华丽的曳地长裙、蕾丝手套、宽边堆花帽子，男士们笔挺的西装，笔直的裤线和见棱见角的绅士帽，真让人感叹百年前



宜夏别墅



鼓岭上的洋人老照片

就荡漾在西方“工业文明”摇篮之下的生活之美……

有一张照片是一位金发女郎抱着一个婴孩。那女郎长得好漂亮，半长的金发微微卷曲着，光洁的额头下，一双狭长的丹凤眼迷离地望着远方，简直活脱脱玛丽莲·梦露。她就是年轻时代的艾伦的婆婆，那婴孩自然又是艾伦的丈夫彼得。母子俩身后的背景是一片深深的草地，远处是他们的房子……艾伦就是根据这张照片推断，此前被判定的那栋建筑不是加德纳故居。为了解开这个谜，她已经忙活很久了，甚至还专程到美国耶鲁大学去查过资料，那里有限地收藏着有关当年鼓岭的一些资料，比如当事人的日记本等等。外国人做事就是一丝不苟，艾伦还几度来到鼓岭，寻访健在的老人，其中有一位程姓老人曾是加德纳家当年的邻居，还有一位是现在仍居住在当地没动窝的郭老伯，说他年少时家对面住的

便是一个美国人家，后来到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修路，那幢房子被拆掉了……

经过几方面汇集的资料，人证、物证、照片证、文字证，最终，郭老伯家和马路之间的一个范围，被认定是当年的加德纳故居所在。房子虽然已不在了，但山形、地貌、河流、树木都还在，人世苍苍，天证更比人证强，在场的所有人都点了头。郭老伯还确认了1925年手绘地图上标注的“海关”和“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位置……

四

艾伦心花怒放！她终于替夫君和公公、婆婆一家找到了故居，寻到了他们的中国根！话说彼得虽然1岁就离开了中国，但在父母双亲的影响下，也深深爱上了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青少年时期就学习中文，为将来重返中国做准备。在哈佛大学期间，彼得与艾伦在做公益慈善活动中相遇，说来也是缘分，艾伦受母亲影响也喜欢上中国文化。艾伦母亲是一位心理学家，特别喜欢中国商代时期文化，还一直尝试着用中国的“五行学说”解梦，来丰富她的心理学研究。小小艾伦记得，自己六七岁时候就爱往唐人街跑，钻到一个个小商店里，东看西看看不够，虽然不懂，但总觉得“特别舒服”，以至于中国老板们都甚感惊奇。就是这种对遥远中国文化的热爱，让彼得和艾伦走到一起，1974年他们结婚了。

当时，他们俩非常想来中国，可中国“文

革”还未结束，根本不允许他们进来。于是他们就去日本待了几年，在那里间接地学习中国文化，同时等待着能回到中国的机会。岁月匆匆，人生扰扰，随着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牙牙学语，在英文与汉语的转换中一天天长大，他们一家终于在1988那一年，来到了日思夜想的中国！

这一待，就已是28年！艾伦说：“到中国来是丰富精神的。尤，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很差，没有车，没有热水，没有暖气，那时候什么都很困难……”

我的喜欢艾伦，一见如故，不仅在于她的“神”，还在于她神采飞扬的奔放性格。虽然已不年轻，但她仍像个小姑娘一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对一切事物还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同时，她热爱生活的态度，就像天堂的歌声一样，能直抵跟她交往的各种性格的人的心。由此我断定，艾伦在家里一定是位“顶梁柱式”的好妻子。这28年的中国经历，他们一家在南京、北京、上海等几地生活过，艾伦自己做过英语教师、电视台英文频道主持人，她还把她的两个宝贝女儿培养成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两姐妹还演过电影，当过网红……她俩的名字原来叫“爱江”“爱苏”，是因为他们一家来中国后首先在江苏南京定居。后来两女儿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觉得还是应该更扩大格局和视野，遂改名为“爱中”“爱华”——你看，这家人从爷爷穆霭仁先生起，到彼得、艾伦，再到爱中、爱华，他们三代人孜孜矻矻，以人类大爱做着中美文化交流的

桥梁，真是太美好的人生幸福事了，点赞！

五

鼓岭位于福州东郊，站在鼓山风景名胜区的东北部，可说是福州人的后花园。“鼓山”的名称来自于主峰山顶最高处，有一片圆溜溜的大石头群，每个大石头都圆润光滑，形状如鼓，“每雷雨作，其中簸荡有声，因名”。与鼓山相比，鼓岭这边的山势稍缓，不及那边的山高，因此便被唤作“岭”了。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况且，鼓岭这边有一巨大的山崖断口，并沿着山势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回廊”，这独特的山形走势，使它连闽江而望东海。海风飒飒，紫气东来，吹开四时鲜花，氤氲常年苍翠，天空竟日蓝，老人多长寿，令人徘徊往复，不思归！

2015年的一天，穆彼得神色凝重，手捧着父亲的一半骨灰，来到鼓岭之麓，闽江之畔。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虽恋恋不舍，但还是遵照着父亲的遗嘱，将穆霭仁老人的这半颗中国心，撒进福建人的这条母亲河中，留在了生他养他的八闽大地上。70年前，他的鲜血曾灌注在这里，浇铸了一朵中美人民的友谊之花；现在，他又把自己生命的一半返归到这里，让鼓岭满山满岭的青翠与鲜活，永远伴着他的仁慈与爱心。

遥远的亲情，叶落归根……

（江一帆供图）

鼓岭的回声

王剑冰

一

我来的时候，福州已经入睡。鼓山那巨大的黑，遮盖着天光，真像是被蒙在了鼓里。车子旋来旋去，直往这鼓的深处去。想起“跃上葱茏三百旋”的诗句。三百旋之后，我也钻进去睡了。

只有到早上，这面鼓才会响起，而且响得很早，那是被一阵有声有韵的鸡鸣敲响，是被杂乱无序的鸟叫震响，是被漫山的林涛摇响，也是被我等初来乍到的人喊响的。还有那些群峰的鼓阵，连绵铺排，四海翻腾，五洲激荡。

我们下榻在鼓岭。猛一听，怎么这里也有个与庐山同名的牯岭？原来音相近，意相远了。鼓岭的上山道可谓多，好像有八条，这八条古道就像八条带子，将一面鼓提起来，让它在云中摇。

二

没有想到，鼓岭会有这么多老式洋房，而且还有教堂，所以它同庐山、鸡公山、莫干山齐名。满是石头的老墙青苔斑驳，有的地方覆了厚

厚的一层，像是一种绒。有些绒是金黄的，似涂料泼了半面。还有的是长长的细叶草，细细长长地垂挂下来，胡须样飘摇。

喇叭花尤其多，鼓和吹总是团结在一起的，你看那些红红白白的喇叭朝天吹得多带劲。还有粉白的绣球，这里那里的把青翠欲滴的鲜艳抛出来，凑着鼓吹的热闹。

我在一处老建筑前驻留。这里曾是一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农历八月十五后关闭，属于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可以想见，在一定时期，它的吐纳还是十分热闹的，而且很多信件飞向了大洋彼岸。我走进去，急切地想见到一枚邮票。曾是这枚邮票，引来了加德纳夫人以及由她带来的“乡情”。

邮局旁有一口老井，怀着小心向下望去，望不到光阴的深处。这个时候，我发现井圈外壁竟然有字，上边刻着“外国、本地、公用”。可以想见这口井旁，有过怎样一段欢乐与友情的时光。

沿着弯曲的山间小路，登上一处较为宽阔的场院，院子里生长着高大的树木，它们衬托着一座老建筑，建筑不高，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一

座石屋。可这座石屋的墙体用青、黑、白不同颜色的石头砌成。显然，建筑者经过精心设计，使其透出波希米亚风格。谁能想到呢？这就是被称为万国公益社的地方。许多交流、交易甚至公益活动都在此举行。它的后面，曾建有七个网球场，现在早变成了菜园。

鼓岭上竟然还有一个游泳池。那是在此居住的美国人修建的。老外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寂寞的还有一头牛，有一天它兀自也下到了里边。喜欢水是一切生灵的本性，外国的人能下去，中国的牛怎么不能进去？这一举动，引发一个黄头发小女孩的惊叫，也让一个镜头快意起来。这个鼓

点怕是一个有趣的杂音。

在一个典型的欧式建筑里，我见到从鼓岭寄出的照片，那些照片还散发着时间的幽香。一张照片上，一群孩子聚集在阳光下，在老房子前笑着，人或已经不在，笑声还在飞扬。

在鼓岭的小路上走，不经意地会看到一种像韭菜样的菜，摆在那里卖，听了半天，才知道它的名字：亥菜。这是鼓岭特有的。有时候，还会见到鼓岭合瓜、鱼腥草和白毛藤。这些采自山间的青翠的野菜，让人一见就欢喜万分。农舍夹杂其间。农舍里，总是飘出淡淡的茶香。不定是哪一面坡地，就有了那些绿浪茵茵的茶园。



修复后的鼓岭邮局

三

早晨出门，下楼的时候，一个女人冲着我笑，我先是以为冲着我身后的什么人笑的，回头看看没有别人，而且到了楼下，她还是冲着我笑着。这种笑里带着鼓岭早晨的纯粹与清润。我也冲她笑了。吃饭的时候竟然坐在了一起。我知道了她叫艾伦，一位美国人，她还有个中文名字：穆言灵。同我一样被邀请来的。艾伦对鼓岭

表现得那么热情，不时地说着鼓岭，仿佛她才是鼓岭的主人。果然，她一会儿就拿出了一张照片：鼓岭的小路上，阳光明媚。一个中国妇人挑着一个担子，前面筐子上担着的小男孩就是她的丈夫彼得。艾伦说那个男孩是他妈妈眼睛的“晶体”。艾伦提到了一个词：kuliang。这个词的发音就像中文的“口粮”。艾伦说她也不知道中文怎么写，反正美国人说鼓岭就是kuliang。我想起老房子里的介绍，加德纳，一位大学物理教授



百年游泳池

去世的时候，嘴里也是叫着这个词，使得加德纳夫人为这个词找了很多年，后来终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个信封，邮票上盖着“福州鼓岭”。加德纳夫人终于找到这里，在加德纳曾经生活的地方激动流连。我看见过她的照片，一个个笑容都储满真情。她甚至搂着一堵石头墙壁欢笑不已。与她同来的，是一群的老老少少，都是当年与加德纳一同在鼓岭的老人与后代。那些人像西海岸的阳光，把鼓岭的从前与今天照亮。他们围在那些老房子前喊着“口粮——”，只是当时他们没有找到加德纳真正的故居。

没有想到的是，现在又有一个美国女子走来，带着同样的对于“口粮”的情感。她又拿出一幅照片，一个美国人手里抓着一只鸡在笑。艾伦的公公是一个医生。一个山民病了，急需一种特殊的血，而她的公公就是这种血。就这样，美国人的血像“口粮”一样挽救了一个中国人。获救的山民拿出了山上最好的东西。艾伦知道了这些，就喜欢上了“口粮”。她一厢情愿地走来，不断地走来，她说她想让口粮“长大”。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声名远扬。

饭后我们分头行动，我不知道艾伦去了哪里，但是吃饭的时候，她惊喜地宣告一个消息，加德纳生活过的故地找到了！这天是2016年11月12日。68岁的艾伦在鼓岭的山上蹒跚，不断地与原住民交谈，而后便有了这个吃惊的结果。此前，加德纳故居被讹传为另一栋洋房。近百年过去，经过海啸和风雨，大片的故居消失了。

艾伦女士，同加德纳夫人连接起来，共同培育和见证了鼓岭的爱情。鼓岭，真的是宏大之爱的口粮。

艾伦还在不断地展示着她丈夫——那个筐子里躺着的小男孩的照片，她友好地冲着每一位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笑着。在她笑着的身后，我看到一棵柳杉，它面对这个世界已经1300年。这棵双干并生的老树，被称为夫妻树。这么说，这两对美国夫妻的爱情事件，也进入了柳杉的眼眸。

四

山下是福州，再远处是海。站在鼓岭上，千山万壑，海空无限。心中着实擂起了鼓点。微风吹来，带起一片清新的香气，却原来这山上，还有如此多的桂花。花香是免费的。那就尽情享用吧。免费供应的还有负氧离子，据说鼓岭的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厘米700到1200个。我搞不懂这些数字，但我知道这些都代表着好，很多人为了这个“好”上山来了。

郁达夫游鼓岭后写道：“千秋万岁，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我抬头望去，鼓岭上空，没有望到仙鹤，却望到了一抹彩虹。鼓岭一个早晨都在下雨，雨点似鼓，漫山遍野叮咚有声。现在晴了，出现了七彩霞。

那是鼓岭的回声。

那一片清风薄雾里有痛更有爱

古 耜

—

驻足鼓岭的那几天，脑海里频频浮现出旅美作家王鼎钧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脚印》中所写的一段话：

你该还记得那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中，桥上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纵然桥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铺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

说来也不奇怪，在鼓岭这片如诗亦如画的风景里，最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固然是清风里的柳杉，薄雾中的别墅——清风、薄雾、柳杉、别墅，被称为鼓岭景区的四大看点——而最叫人浮想联翩、思绪绵绵的，却分明是在诸般风

景中一次次上演的“捡拾脚印”的故事——当然，这故事不是虚幻的“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戏说中的“鬼魂”，而是一批批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寻踪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

我相信，鼓岭那弯曲的山道上和葱绿的柳杉间，应该留下了他们清晰的身影与足迹——

晚年定居美国洛杉矶的力玛莉女士，因父辈就在中国而出生于民国初年的鼓岭。长大成人后，执教于福州城内的华南女校。1940年，在日军逼近福州的严峻形势下，她和家人不得不撤离福州和中国。回到美国后，力玛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的学生们写了一封发自内心的致歉信：由于匆匆离校，有一节英语课未及上完。她希望早日返回中国，为大家补上这节课。孰料此后国际风云和个人境遇双双变幻，这一别竟是40年。1980年，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华发满头的力玛莉终于回到鼓岭。在依旧留存的故居前，她想到的不仅是童年的欢快和青春的美好，同时还有传播文化知识的夙愿。为此，她情愿抛

下舒适的生活和绕膝的孙儿，于1984年再度来到福州，进入刚刚恢复的华南女子学院，讲授公共英语，从事义务教育，直到一年期满。

美国教会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院长蒲天寿和他的母亲，早年曾在鼓岭度过夏天。1984年，蒲天寿的女儿 Betty 率领整个家族重游鼓岭，以纪

念祖母蒲星氏来华100周年；2010年底，Betty 同丈夫、两个女儿及女婿和孙子，再次来到鼓岭，寻访前辈的踪迹和记忆，续写中美两国的民间友情。

密尔顿·加德纳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他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快



鼓岭基督教堂



鼓岭胜景

乐的童年时光，而夏日鼓岭的情景，尤其使他难忘。加德纳夫妇与鼓岭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中美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而且把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吸引到福州鼓岭。

从这以后，有更多的外国朋友远涉重洋，前来鼓岭寻踪觅迹，捡拾前辈的脚印。他们当中有终生想念中国的加德纳先生的侄孙加里·加德纳和李·加德纳兄弟；有当年第一个在鼓岭建起西式别墅的英国人托马斯·任尼的后人莎莉·安·帕

克斯女士；有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人程吕底亚的后代、来自夏威夷的戈登·特林布先生……就在我采风鼓岭的同时，又有一位研究鼓岭文化的美国学者穆言灵女士前来寻踪结缘——她的公公穆霭仁曾是陈纳德将军麾下飞虎队的成员，抗战结束后，执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她的丈夫穆彼得生在福州，曾和家人一起在鼓岭度过了一个夏天。而穆霭仁一家在鼓岭的住所，正好是加德纳一家返美时转卖给他们的房子，即加德纳故居。



鼓岭柯坪水库

这种特殊的因缘巧合使得穆言灵对鼓岭别有一种深情。在共进午餐时，她激动地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景太迷人了，我太爱这个地方了。”“不久以后，我会带着全家来看故居，这里有我向往的一切！”她还表示：“明年春天，我准备带一些外国孩子来这里，拍一个纪录片，传播绿色的东西。”可以相信，随着时光的迁流，像穆言灵这样热爱鼓岭、愿意传播鼓岭文化的国际友人会越来越多。

二

今天的鼓岭大地上，回荡着外国友人留下的诚挚而热烈的赞美。每当读到或听到这些，我和土生土长的鼓岭人一样，心中自会蒸腾起欣悦乃至自豪之情。只是这美好的情愫里，又总是掺杂着某些异质的、矛盾的、一时难以说清的东西。它仿佛在提示我：脚下的鼓岭，并非一向晴川历历，鸟语花香。在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处，它原本



观景台

饱含着难以消解的疼痛与哀伤——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福州正是被开放的“五口”之一。从那时起，福州地面上，开始有了“洋人”的踪影。后来，随着以茶叶为主的中外商贸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洋人”抵达福州，到1866年，至少有17个国家在福州建立了领事馆。

1884年，马江之战爆发，福建水师遭受法军重创，清廷船政事业由此一蹶不振。而列强势力则如日中天，一时间，数不清的西方外交官、牧师、商人、医生和教授云集福州。

1886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医生托马斯·任尼在鼓岭建起第一座夏日别墅。此后，陆续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等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和侨民到鼓岭避暑纳凉，并兴建别墅。据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鼓岭上的洋人别墅在鼎盛期曾达300多座，夏日住在别墅避暑的外国人数以千计。

时至今日，对于上述历史，已有学界达人试图作别开生面的诠释，然而在我看来，不管学者的理论如何新潮，思路怎样巧妙，这段历史本身所承载的闯入者的强悍与骄横以及本民族的屈辱和劫难，仍然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评价那段历史的重要前提。正因为持有这样的执念，我在观览洋镜头留下的鼓岭影像时，脑海里便多了一份敏感、疑惑和警醒：

——盛装华服的外国女士和先生们三五成

群，或窗前聚叙，或户外纳凉，或山坡眺望。他们在一起说些什么不得而知，只是那舒展、惬意且略带骄矜的神情，总让人想起坚船利炮的作用。

——一个洋人家庭出行，几位轿夫和挑夫在一旁伺候。这在当年的鼓岭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场景。然而，这司空见惯的场景偏偏隐藏着鼓岭劳动者习以为常的艰难生存。请看曾当过轿夫的王英思的回忆：“那时候，我才30来岁，一到夏天就要去当轿夫。下半夜扛篋跌跌撞撞下山，再抬上外国人和他们豢养的巴儿狗、狼犬后，赶在午前回来。下山上岭有4000多层石阶。”（《鼓岭史话》）内中的悲苦与无奈，早已超出了今人的体验和想象。

——原住鼓岭的中国乡民也被收入外国人的镜头：7位裹了小脚的妇女横坐一排；十几位头上留了辫子的男子手持折扇，分三排而坐，据说是日间在鼓岭上课的学生；11位乡民中有七八位赤裸了上身，他们在低矮破旧的农舍前或坐或立，大约是劳作间的小憩……我们没有理由挑剔这些生活场景本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只是这样的客观与真实，是否也有意或无意地渗入了拍摄者特有的、当年曾被鲁迅所抨击的“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的观赏乐趣和猎奇心理呢？

面对如此的历史镜像，我还是感到了苦涩和沉重。

让人稍觉宽慰的是，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当年的鼓岭之上，最终保持了大致的平稳与

安宁，有些时候，有些场合，甚至洋溢着和谐、欢快与融洽。不是吗？鼓岭邮局（1902年6月16日开办）门外不远处，有一口水井，上面刻有“外国、本地公用”的字样，不管这样的说明出自何人，有何背景，它所传递的基本信息与当年口岸城市外国租界普遍存在的华人歧视，分明截然相反。今天的鼓岭老街上，外国人修建的游泳池依旧保存完好。据说，它最初照搬西方文明，是男女共用的，但听到当地人所谓“有伤风化”的议论后，便改为男女分用，游泳池也由一个变成了四个。这当中无疑包含了外国人对中国国情和风俗的理解与尊重。在鼓岭文化发展与旅游论坛上，穆言灵女士向大家提供了一张照片：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国男子手里提着一只鸡，正喜气洋洋地走在鼓岭的山道上。据穆女士介绍，这位男子就是她的公公穆霭仁，当年他给一个中国人输了血，中国人便以鸡相赠，作为回报。这个镜头是珍贵的，也是感人的，它足以让人想起“爱心无国界，人间有真情”的说法。诸如此类体现了中外民间友情的事例，在旧日鼓岭上还可找到若干：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可以免费让中国人前来就读；外国人修建的网球场并不拒绝中国人参与；外国人举行的生日宴会竟然也邀请其中国邻居……

三

在西方列强挟炮舰撞开天朝国门的严峻背景

下，鼓岭之上何以会有这一幕幕的友善、和睦，其乐融融？要厘清此中原委，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年鼓岭情况存在的某种特殊性。

罗素曾把西方人到中国来的目的概括为：打仗、赚钱和传教。作为对晚清西方人在华行为的一种整体描述，这堪称准确而精到；只是具体到此间登上鼓岭的外国人来说，情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离开炮火连天的战场，打仗已是无从谈起；置身绿水青山之间，赚钱的欲望也阶段性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休闲和尽情的娱乐；传教的热情倒是渐趋高涨，清脆的钟声伴随着悠扬的诗唱，成了鼓岭上空特异的声响。而无论休闲还是传教，都需要尽可能协调友善的人际关系，也都会很自然地派生出宽松的氛围与平和的情调。更何况“爱”是基督教思想的内核，以人的善行来表达神的爱心，正是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方式。

至于鼓岭上的中国乡民，一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之中，耕读齐家，积累财富，应当是他们最强烈也最稳定的愿望。大批外国人登岭，并没有破坏原有的一切，相反还带来了新的社会景观和生活内容，特别是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经济。面对骤然出现的生财乃至生存之道，他们显然没有理由不做出欣喜而积极的回应。

百年鼓岭，有痛也有爱，有歌也有哭。当这一切以“复调”的笔法写入历史长卷时，鼓岭的色彩便丰富厚重了起来。

古厝人家

邱泰斌

鼓岭，屹立在福建母亲河闽江下游，距福州城中心约 13 公里，方圆 24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800 米左右，是大鼓山风景名胜区雄秀群峰、叠嶂山峦中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为福州镇山。夏季气温不逾 30 度，比福州城低 5~10 度，不愧为名符其实的宜夏村，史上与江西庐山牯岭、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人们曾总结概括说，鼓岭有三大特色或曰三绝：“清风薄雾柳杉王”。这一说实际上赞誉的主要是鼓岭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而我认为鼓岭还有一绝即第四绝，为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也是最重要最显著的特色——古厝人家。

“古厝”在此指的是带有福州方言称谓特点的鼓岭古民居、古洋房；而“人家”既指人又道家，道的是曾经在鼓岭居住生活过的中外村民居民。

历史上在鼓岭居住生活的主要有三部分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迁移而来的各姓氏后裔；侨

居避暑的外国人。据出土的陶片证实，这里自商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我想这可算为最早的原住民吧！此外可能有汉武帝徙民时逃匿而来的部分闽越遗民。位于宜夏村中心梁厝（其后门山如今为柳杉王公园），被当地人认定为风水宝地。据说，这里地形酷似一位王爷（旧时山前还有座王爷庙），左手拥有聚财之坑，右手握着做官之印，颇富财源官宦之像之兆，宋朝梁氏先祖因此弃官选此隐居，后渐成梁厝村。距今 200 多年前的清朝嘉庆年间，鼓山后屿郭氏始祖开始迁移入驻鼓岭蟛蜞岭，如今已发展到百户千人之众，成为鼓岭大姓，与移居鼓岭过仓近 400 年的刘氏相当。

时至清朝五口通商，福州开埠，光绪十一年（1885），鼓岭这座闭锁于深山僻壤的世外桃源，被美国传教士兼医生伍丁无意间发现并传播出去，而在这里建第一座洋人别墅的为英国领事馆馆医任尼。任尼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于西侨

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的带动下，美、英、法、日、俄等 20 多个国家的外国侨民、外交人员、传教人士接踵而至，这里渐成遐迩闻名的中国第一个洋人夏季避暑度假区。

那些洋房被当地村民方言称为“番仔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岭上已有别墅 80 多座。当年曾有一场台风过境，摧毁别墅 68 座，但很快又陆续修建。不仅外国人在盖，中国人也在盖。民国二十四年（1935），避暑用房建设达到鼎盛期，高达 300 多座，日最高人流量达 3000 人次。当时山间平地甚小，民居 101 户，人口 600 余人，中分七区，以梁厝里、蟛蟹岭两区最为热闹。直至 1949 年新中国诞生时，鼓岭还有外国人 100 多名居住。20 世纪 50 年代初，外国人撤走后，绝大部分别墅被当地农民占为私有，相当部分被拆了重建。

鼓岭海拔高、湿度大、台风过境、雾重湿冷，从岭脚到岭面有石阶 3800 多层，且狭窄如羊肠，陡滑而险。当时洋人上下鼓岭均坐山轿（即当地土制轿子），每人每趟费用 2 元左右。这些都给在鼓岭建厝盖房带来了特殊元素，注入了鲜明的个性色彩。

鼓岭古厝建设管理，体现着中西建筑文化在这里的碰撞交融与和谐发展。

鼓岭西洋建筑，渗透着福建建筑元素和思想，它们多为石结构或石木结构，建筑材料以本地产的花岗岩为主，采取整砌和乱砌相结合的方式，柱子形式为矩形，木构，周边为中式特色的

双开百叶状栏杆，主要为成品的欧式花瓶栏杆。走廊宽大，最宽的达 4 米，作为乘凉和悬挂秋千的场所。每幢房向北一面用石块砌成防风墙，墙体厚实，最厚者达 4 米；有些室内设有壁炉，有的还设地窖。建筑物采光、通风良好，冬暖夏凉。其中多属避暑性暂时住所，大多单层，规模较小。洋人在岭上过了避暑期后，物业多交由当地村民管理。

宜夏老街是鼓岭的核心部分，为中国最早的洋人别墅小镇。老街街道顺势蜿蜒，建筑依山就势，造型体现了山地建筑特色，更融入了很多西方建筑艺术和理念，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文化交融交汇的状况。这里既有以福州特色木构建筑、古园林等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又有来自各国风格的洋人别墅、社区设施、教堂等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作为市场，当时街上全为石头铺地，平坦宽大。这条全长仅两三百米的商业街，当时被誉为“最美山村洋人街”，如今还保留有不少中西合璧的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

建造于 19 世纪末的万国公益社，是福州最早的西式俱乐部。整座建筑坐北朝南，石木结构，屋内大梁上有吊顶，厅内面积宽大，福州民居特色建筑内部布局结构鲜明，而内部功能又结合西方建筑思想，设歌舞厅、戏台、化妆室、更衣室等。外立面中西结合。南向为福州特色建筑风格，屋顶以双坡顶和四坡顶形式的中式风格为主，以福建常用的灰瓦，上压镇石。北立面为西式建筑特征，窗户以原木色木门窗为主，双开百

叶状。内墙体由不同颜色石头砌成，石灰勾缝，为波希米亚风格。

鼓岭老邮局，属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之一，建筑形制为福州民居特色，原为尖顶石头建筑，营业厅、办公室宿舍厨房，三座毗邻，内部装修为西式风格，外部为中式坡屋顶形式。鼓岭老邮局证明着福州为历史上中国联系世界的对外窗口，还为美国加州友人加德纳夫妇寻梦中国福州鼓岭起了牵线搭桥作用。如今一座修

旧如旧、别具一格的古厝邮局赫然屹立于鼓岭：单层石构建筑，青石墙体，单坡瓦顶屋面，透逸着早期西洋建筑风格。

宜夏别墅，传为英国人任尼在鼓岭建造的最早的一座西式别墅，也是1992年8月22日加德纳夫人到鼓岭替夫君和自己圆梦之处。加德纳夫人曾在这里住了一宿，称睡得最香。岁月悠悠，几经修建之后，如今宜夏别墅的陈设虽已大部改变，但内部格局却变化不大，仍是外国人家中常



见的弧形偏厅，而屋外仍有纳凉大平台。别墅两旁，耸立着两株高大挺拔的百年柳杉，青苔密布。

美国加德纳家族曾在鼓岭建过别墅，传为石头所筑。20世纪40年代，中国基督教领袖倪柝声从加德纳父母手上买下，抗战胜利后为中国政府收回。

“金厝边，银乡邻”，福州百姓信奉这种生活哲理和信条。鼓岭村民与避暑洋人接触，起先可能会有些磨擦，但同在一个山头，抬头不见低

头见，况且村民靠的是年复一年的洋人避暑过日子讨生活。经过磨合，以诚相待，你来我往，你帮我助，中外人家便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了。

当年洋人进驻鼓岭避暑居住，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医疗技术，并倡导和推行慈善事业。洋人在鼓岭创办了两所学校，中外共读，让村民孩子免费上学。这里曾培养并走出了山村第一位大学生。英国馆医任尼在福州扩建了“福州塔亭医院”（今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之后，到



鼓岭老街

鼓岭建别墅的同一年筹办了“万国公益社”，并筹建了鼓岭第一所侨民医院（鼓岭卫生院前身）。洋人医院给当地村民免费看病。村民谁家老人去世了，外国人也会前往慰问吊唁。特别是1907年洋人就开始在鼓岭进行基督教传道；1919年办起了第一座礼拜堂，办信徒训练班，此后这里曾成为相当于全国性的神学教育机构。至今，那些当年受益的百姓还对外国人在鼓岭生活时的各种善

举心存感念感恩。鼓岭村民信奉基督教者甚多，曾占原鼓岭乡人口五分之一。受此影响，鼓岭女基督教徒缠足的就很少。

外国人讲究生活，村里歌舞厅、游泳池、网球场一应俱全，白天爬山、摄影、打球、游泳、打猎，晚上就欢聚在万国公益社唱歌、跳舞。年复一年潜移默化，也影响了鼓岭村民。洋人打网球时，鼓岭村民小孩就在旁观球捡球。由万国公



益社组织的每年一次的网球比赛，为鼓岭的一大盛事，不论国籍、阶层，均可参加。洋人在鼓岭过生日过节日也会邀请中国人参加，并且倡导妇孺平等，一律上桌。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来二去，投桃报李。鼓岭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办村庆，每届清明节郭氏家族大规模办春酒，以及其他一些当地风俗文化活动，鼓岭村民每每会邀请驻岭洋人参加，这些洋人也会欣然受邀甚至携友参加，并乐此不疲。

鼓岭是福州天文现象的最佳观测点，当地人形成了观测流星的习俗。此时，外国人如在村子度假并爱好天文观测，也都会积极参加这种祈福祝愿活动。

老子与耶稣、稀饭与牛排、筷子与刀叉、办春酒与做礼拜、汉语方言与外语西话，中外人家共同生活交往在鼓岭方寸之地，进行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民风习俗、语言障碍等方方面面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

童心无邪。鼓岭村民与驻山洋人的小孩们两小无猜，日久生情，终身刻骨铭心。加德纳家族与鼓岭留下了四代人百年不解之缘。在此地生活生长10年的幼子加德纳，对鼓岭嵌刻了终身难以割舍的眷念和遗憾，他幼时在鼓岭曾经常与村民小伙伴开展攀爬柳杉王大树比赛。加德纳的二哥瑞·厄尔曾经参加过鼓岭打虎队行动。外国友人莉莎·帕克斯有着“双重鼓岭缘”，她既是英国人任尼的后裔，其丈夫又是曾经在鼓岭生活过的美



鼓岭井上依稀还可辨别的“本地”“外国”“公用”刻字

国友人麻德安。2012年9月27日，莉莎·帕克斯应邀参加了鼓岭世界旅游日寻梦活动，她情不自禁伸开双手抱在宜夏别墅墙上，激动不已：“祖辈，我今天回家啦！”

鼓岭老街之上，迄今保留着一口完好的百年“鼓岭井”，井壁上并刻着“本地”“外国”“公用”三词。当初是鼓岭村民单独还是中外居民共同在千尺之巅的高山地理条件下挖掘水井，因未见记载不得而知，但其艰辛可想而知。而此口水井公用共用则早已载入史册。一个多世纪以来，“鼓岭井”微澜清澈，源源不断，满满的动人故事，盈盈的中西情怀。

随着我国对外窗口的日益敞开，国际友人的不断寻访，一度萧条寂寞的鼓岭及其老街正在得以逐渐苏醒。鼓岭古厝人家将更透射出其神秘诱人的魅力！

弦歌犹响起魁岐

——福建协和大学百年祭

伍明春

福建协和大学是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校之一。上大学时，虽然在学校的校史文字中读到一些协和大学的相关叙述，但由于时空的阻隔，对于当年这所闽地名校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个抽象符号的认知层面。直到2007年，因受命协助孙绍振先生编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我来到学校图书馆民国文献阅览室爬梳历史文献时，才在《协大艺文》《协大周刊》《协大学生》等尘封的刊物中，经由其中充满青春激情和理想色彩的文字，真正找到了自己和这所大学隐秘的精神关联。

筚路蓝缕

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1911年就开始筹建，经早期倡导者约翰·高绰（John Goucher）、高智（John Gowdy）、苑礼文（Abbe Livingston Warnshuis）、何乐益（Lewis Hodous）等人数年的多方奔走和不懈努力，于1915年正

式创立。首任校长为美国传教士庄才伟（Edwin Chester Jones）。1916年2月16日，福建协和大学迎来第一批共86名学生。协和大学最初的校址位于福州仓前山观音井街，租用了一个旧俄商茶行作为临时校舍。创办之初的协和大学，得到了同样具有教会背景的英华书院和格致书院的大力支持，它们分别为协大学生提供了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的使用便利，使协大的教学计划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1922年春天，协和大学从观音井迁往位于闽江北岸、鼓山西麓的魁岐村的新校区。这个新校区占地约50英亩，校舍的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基拉姆·墨菲完成。这位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师，创造性地把东方庙宇屋顶的形制等元素运用到包括科学馆、校长楼、学生宿舍等在内的大学校园建筑上，成就了协和大学建筑群的独特风格。不过，万事开头难，新校区的建设一开始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关于这点，从服务时间最长的协和大学教师兼管理者徐光荣（Roderick

Scott) 的叙述中, 可以窥见一斑: “当庄才伟眺望着这片由他、何乐益、高智、威拉德·比尔德及其他中国助手购买的土地时, 这儿除了一些稻草、甘薯地和光秃秃的红色山坡, 其他什么也没有; 除了‘风水’的原因在庙宇和坟墓周围保存了一些高大的松树林, 根本就看不到树木”, “从福州到校园没有路, 从校园到塔形锚地也没有路; 没有运载木料或砖石的汽艇或货船可以停靠的码头;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处女地。”(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 尤其是校区内原

有坟墓的迁移问题, 直到 1927 年第三任校长林景润执掌协和大学时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过, 就整体而言, 协和大学的建设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魁岐这块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 不仅仅是协和大学的大楼, 还有协大人坚韧向上的探索精神。

最初的几年, 魁岐新校区的教师住宅尚不完备, 很多教职工每天只能乘坐小汽艇从仓前山的住处来到新校区上班。受好友、协和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之邀, 1923 年 9 月到 12 月, 叶圣陶



协和大学文学院旧景

曾在协和大学短暂任教，其间就寄居在郭绍虞仓前山的家中，他在散文《客语》里这样写到仓前山的风光：“向来不曾亲近江山的，到此却觉得趣味丰富极了。书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场，闲闲地流着闽江。彼岸的山绵延重叠，有时露出青翠的新妆，有时披上轻薄的雾帔，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好些云，却与山通起家来，于是更见得那些山郁郁然有奇观了。”想当年福州尚无高楼大厦遮挡视线，叶圣陶从仓前山所眺望到的，恐怕就是市区的于山和乌山了。显然，这座南方城市特有的山水景观，多少慰藉了这位客居作家的浓郁乡愁：“仓前山差不多是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

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里送出一声钟响，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纸伞的女郎。”叶圣陶笔下流露的诗意，其实也可以看作当年协和大学教师乐观豁达精神的某种写照。

尽管创业艰辛，但富有远见的早期倡导者们为协和大学未来的发展，定下了高远的目标。1916年2月28日，何乐益就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不无骄傲地宣告：“我们开始了。我们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中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当然，协和大学也没有忘记服务本土经济社会的责任担当，把培养本土精英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福建聪明的小伙子和姑娘离家到北方或者南方城市是一个长期的传统，他们在那里常常获得突出的成功，而他们



协和大学校门口的码头（耶鲁大学收藏）

本应为之服务的家园却衰退了……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换言之，让闽地优秀青年不必走出福建也能打破“在家为虫”的魔咒，成长为一条活力四射的龙，正是协和大学培养人才的要义之一。

昔年风华

1936年2月，刚抵达福州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就在《闽游滴沥之一》中写下了一段与协和大学学子邂逅的真切感受：“福州的情形不同了：从前是只能从马尾坐小火轮去南台的一段，现在竟沿闽江东岸筑起了一条坦坦的汽车大道，大道上还有前面装置着一辆脚踏车，五六年前在上海的法界以及郊外也还看得见的三轮人力车在飞跑；汽车驶过鼓山的西麓，正当协和学院直下的里把路上，更有好几群穿着得极摩登的少年男女，在那里唱歌、散步，手挽着手的享乐浓春；汽车过后，那几位少女并且还擎摇着白雪似的手帕，微露着细磁似的牙齿，在向我招呼，欢笑，像在哀怜我的孤独，慰抚我的衰老似地。”显然，协和大学的充满活力的学生们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少女的眼神和笑靥，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的舟车劳顿，瞬间就烟消云散。斯人已逝，文字犹存。且让我们走进协大学子们丰富的诗文世界，领略他们当年别样的青春



大道修通后通往马尾的汽车 福建师大档案馆藏

风华吧。

我们可以读到如此清丽而富有想象力的散文诗：“蔚蓝天空时时飘过朵朵白云，鼓山的绝顶峰有时插在云外，有时又笔直立在眼前。薄云从它顶上摩过时，好像少女膨涨的乳峰在白纱内颤动。碧绿山头露骨的岩石润湿着清泉，闪闪银色光芒。几缕炊烟夹着山腰里雾气漂浮。猛低头，流水带来山间春色，涌不尽她泌出的心泉。”（《晓英：紫藤花垂垂一串》）“花，红的魂，展笑吧！不良的冬天已逃去迢迢。闪开双眼，看月亮新妆，倚天窗，凝眸向清溪之柔流。花，收拾你美丽的厅堂，黄莺飞来了，将把你底青春编做雅歌一首，唱于清朝。”（梦者：《昨夜我听过黎明》）少女、花朵、流水和春色，构成了青春意象的绚丽色彩。

而在另一些诗里，我们读到的是浪漫主义的

感伤情绪：“告诉你，你的青春一天病倒，/我将用这颗心当做棺材，/在月光中把你葬埋，/因曾把她和月光一般看待，/以后更要给月光二倍的怜爱。//告诉你，你底青春一天病倒，/我将用这颗心当做棺材，/在花香中把你葬埋，/因曾把她和花一般看待，/以后更要给花二倍的怜爱。//不过当我也死时，那个夜深，/要月光给我一缕光明，/带它走进黑暗的天堂，呀，黑暗的天堂！/要花也给我一丝香馨，/在黑暗的天堂我回想你青春的灿烂。”（宋琴心：《寻》）“我愿悠久流连在山谷，在海滨，在十字街头的酒坊。/对着溪水，海涛，明月，一杯一杯地把美酒送到柔肠；/沉醉在山之崖，水之湄，明月之下，尽情地歌唱。/一杯一杯再一杯，/搂抱着，长吻着，朋友，爱人，心肝。”（沈雪玲：《残夜冷梦》）

如果从诗艺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诗作自然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不过，这些作品却为我们了解那一代青年的心灵和情感，提供了一些真实而丰满的样本。

抗战爆发后，福州也很快面临着沦陷的危险，协和大学决定迁校至闽北山城邵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协大学子关于青春主题的抒写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静点吧！灵魂！/有时间的轻骑/将要像泼水般的到来。/二十年后，/如今又是一个开头；/给我力量！/我将粉碎习惯的锁链；/天之南抓把土，/地之北抓把沙，/朋友的心里取堆泥，/敌仇的眼里分块石，/经过火，/经过水，/再塑成一个新的我。”（辣椒：《守岁》）我想，

这里呈现的全新形象，不仅仅是诗人的自我，也是烽火岁月中的协大学子自强不息的精神群像。

薪尽火传

曾担任过代理校长和教务长的徐光荣在谈到协和大学从水路内迁邵武的艰辛历程时，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一所大学的要素——教师、学生、基本设施——都在那里了；而且，福建协和大学的校训——服务，牺牲，爱——在运送中没有丢失，也没有损坏。”（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其中流露的自豪和自信令人敬佩。这种自豪和自信，在协大学生郭毓麟1935年模仿王勃《滕王阁序》而写作的《协和大学序》中得到强烈的呼应：“鼓山西麓，闽江东岸，文楼峻峙，簧舍遥连，登高轩而望榕城，步坦途而通马尾，春秋佳日，诵弦聚遐迹之人，夙夜良时，士女究精深之学。粤稽古籍，名锡协和，友朋缔声气之交，师傅尽中西之美，长假山川之秀气，培育奇材，不缘雕琢之良工，生成妙景。”在这里，一个学术伊甸园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协大学子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密切关注着时代脉搏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过千帆于水面，集万响于山间，地势旷而晨曦明，屋宇高而暮云聚，斯文未坠，宁无作赋之人，令节偶逢，定有题诗之客。分四时以异景，合群彦以同欢。呜呼，国事蝸蟻，民生涂炭，江山破碎，寇贼纵横，倘击楫之同心，危犹可挽，若补牢之不力，悔也何追？”

所望多士辛勤，诸生砥砺，先忧后乐，早存拨乱之心，许国忘家，同具匡时之志；际风云而直上，播雨露以咸沾，国脉虽伤，转强可冀，民心未死，中兴未晚。”

正是这份得到完整保存并发扬光大的无形精神资产，既让协和大学即使在动荡年代也能守住学术的初心，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也激励着它的继承者福建师范大学接过接力棒，向前方奋力进发。

俞元桂先生的学术成长路径就是一个范例，他1942年从协和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一年后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到1946年研究院毕业时，得到当时执掌协和大学中文系的业师严叔夏先生的提携，回到母校担任讲师。关于这段师生情，俞先生曾这样写道：“师生情相当奇妙，它与因血统所派生的亲疏尊卑关系不同，也与因法统所形成的上下级职务关系有别，它是由于知识的传授形成的特殊关系，纯出于机缘，是自然、平等、自由、无约束的，因而弥足珍惜。”（《晓月摇情·后记》）俞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传为学林佳话。作为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培养、提携的学生，很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俞先生的弟子们，大多继承了他乐于育人的精神血脉。

今年深秋的一个正午，阳光很好，我兴致勃勃地驱车前往魁岐村，希望能在民国老建筑中寻得协和大学的几分流风余韵。好不容易通过汽车

导航找到了地点，却被制药厂的保安拦了下来，几经交涉，对方以厂区生产重地为由，将我拒之门外。我对他们的规章制度表示理解和尊重，毕竟现在这里不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后来我沿着制药厂的围墙走了一段路，当我向厂区张望时，目光越过新建的厂房和丛生的树木，居然看到了好几个民国建筑的屋顶，那正是典型的“亨利·基拉姆·墨菲式屋顶”，赶紧用手机拍下留念。就在那时，制药厂机器的喧嚣仿佛完全停止了，我的耳边隐约地响起了协和大学悠扬而有力的校歌：

协和大学闽江东，世界潮流此汇通；高山苍苍，流水泱泱，灵境产英雄；萃文化，作明星，明星照四方。无远弗届，真理是超；乐群众于一堂兮，作世界大同之先声；协和协和，大德是钦！



协大校徽

（协和大学校友藏 池志海供图）

这样的文字来赞美协大魁岐校区的景致：“人们从马尾到南台，在那宽平的闽江上，欸乃的桨声中，瞥见这样的一个村落，几乎要疑心是随波泛进了仙境，最少也要追会着牛津剑桥的风味。”

19世纪末美国著名建筑师弗雷德里克·罗·欧姆斯特在主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规划时，对大学校园的选址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大学校园应与城市保持适当距离，校园环境应是自然的、公园式的，这种优美环境能够陶冶和培养学人格。协和大学的选址恰恰契合了欧姆斯特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协大的招生简章中是这样介绍魁岐校区的：“本校位于鼓山之麓，闽江之滨，风景佳丽，远离市廛，为天然读书之所，且宜于身心之修养。”庄才伟校长的朋友，美国韦斯利安大学历史系教授乔治·B·达切尔也曾经赞誉道：“新校址也许会列名世界上最好的十所大学的位置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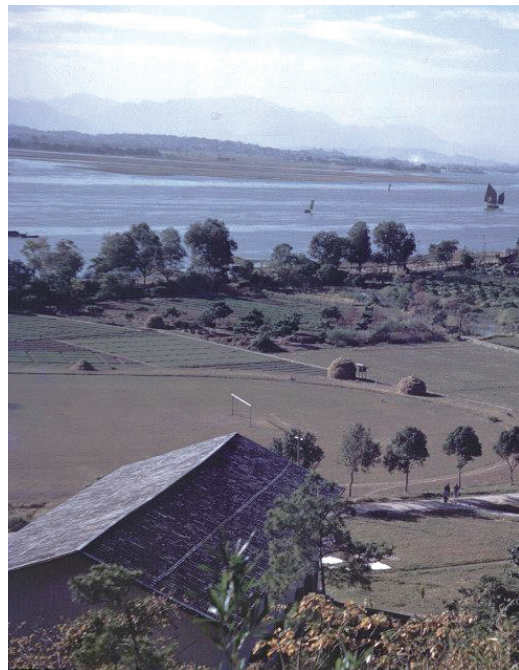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天然读书之所”，那么校园建设自然也不能草率。为魁岐校区做规划设计的是著名的建筑师亨利·墨菲。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建筑师，在纽约的麦迪逊大街和上海都开有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协和大学邀请他设计校园之前，他已经为长沙雅礼大学、北京清华学堂和上海沪江大学做过校园规划和部分建筑的设计。在亨利·墨菲主持协大魁岐校区建设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协大董事会在择定魁岐校址后，在总设计师的人选上，最先得到庄才伟校长青睐的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建筑师——何

士（Hussey），这位建筑师曾经参与设计北京协和医院一期工程。但是何士根本就未到魁岐进行实地考察，他所提交的最初的平面设计图也就没有结合魁岐的地势，方案自然无法实施，协大董事会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决定另觅人选。而后，协大就与亨利·墨菲邂逅了，庄校长这一次郑重地邀请他来福州对魁岐进行了3天的考察。在仓促的行程中，亨利·墨菲仔细调查了校园基地和当地的建筑形态，表现出了认真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而他的设计思路、工作方式和对中国建筑的准确把握也让校董们十分满意，于是在董事会上，校董们一致同意聘用亨利·墨菲担任协大魁岐校区的设计师。

亨利·墨菲一直对中国传统建筑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并试图在西方的现代和东方的传统中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应该还是燕京大学的规划设计。这座校园被世人赞誉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



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手绘的燕大建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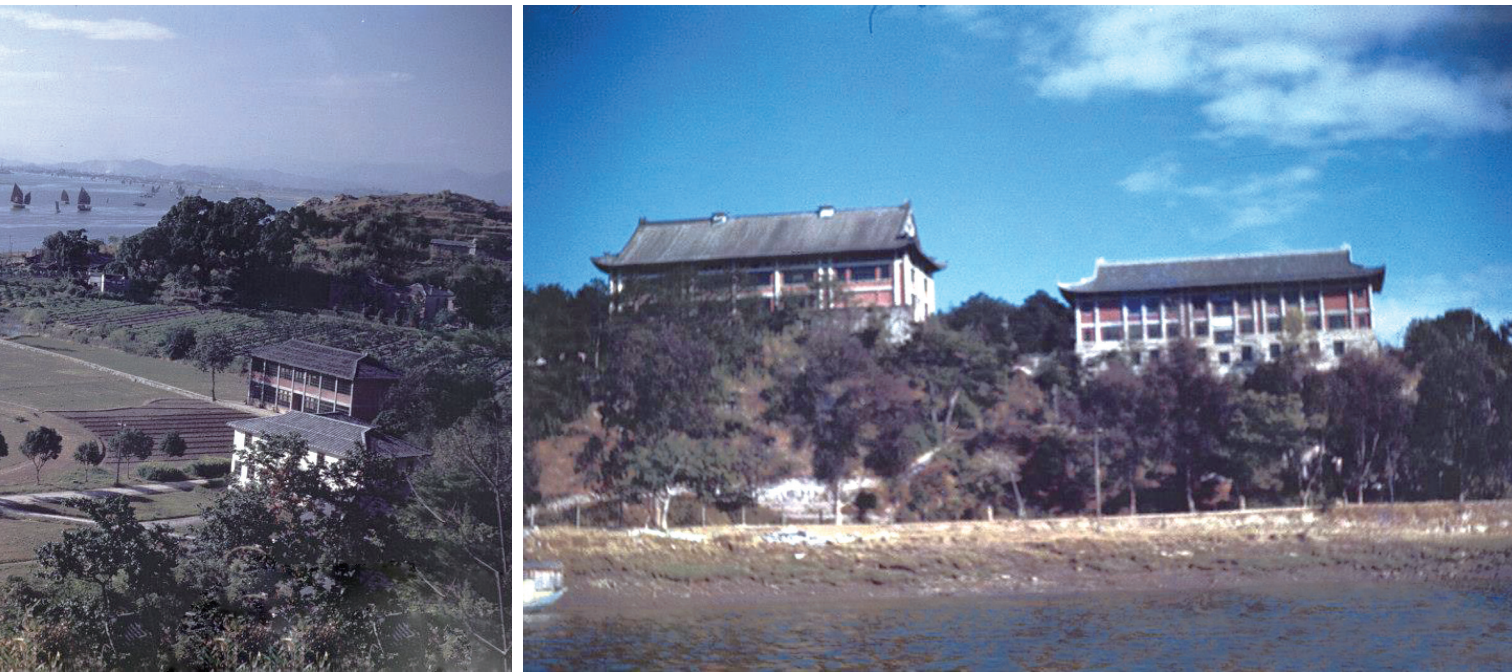


环境最优美的一座校园。建筑大师梁思成对他的设计也是赞誉有加：“……（燕大建筑）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 Murphy（墨菲），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

在燕京大学的项目接近尾声时，亨利·墨菲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式校园的建设理念：“‘陈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个形象的比喻，直接说明了我們试图在燕京大学项目中想要表现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使用新材料钢筋混凝土来建造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句话或许可以替换成‘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更愿意将我们这种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改造，想象成以粉饰古老的建筑，来提供给中国，

像燕大这样全新的教育环境。”亨利·墨菲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外国设计师来说，更加理解中国建筑的内涵，他在保留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西方现代化的建筑理念植入其中。他对传统进行复兴的理念，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由他倾力打造的坐落于东南之滨的协大魁岐校区，也正是他奠定此理念的重要基石。

重访魁岐校区，依然能够感受到亨利·墨菲那因地制宜、巧具匠心的设计：建筑的布局适应山地走势，已具有了现代大学校园的雏形，教学区、生活区和运动区分布清晰。文学院和理学院这两座主楼修建在山脊顶部，鸟瞰闽江，而山脚



1948年福州彩色风景照之建筑系列，照片由穆彼得先生提供

平地之处曾有大片的实验场，为校园的学科的扩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派员到协大考察，“对本校办理之精神，成绩之优良，每有极好报告提部……教育部对本校教育事业极为关注，爰于廿三年度（即公元1934年）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中指拨12000元充为本校科学设备费。该款由教育部按月汇给，本校得此巨款补助，科学设备将见丰富，办理精神日形奋发。”协和大学的校园建设的出众可见一斑，即便在当时福建的众多学校当中也可谓一时无两。

如今的魁岐校区，已不像当时其他的教会大学那样，仍作教育之用，但旧时景致仍在，漫步其间，思绪飞扬，协大老照片里那些青年才俊们

怀揣着理想挥洒青春的样子也一幕幕投影在现实的景致中，脑海中浮现出协大老校友们在毕业纪念册上的寄语：“‘今朝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在绮丽的鼓山麓生活过四年的人，在媚人的闽江滨印过无数足迹的人，更易恋恋于校园的风光，不忍猝然离去的。然而，光明的新社会正张着慈母似的胸怀要我们投入她的怀抱，我们为啥不欢然就道呢？别了，协大！我们为开辟出更多像你这样美丽的花园而努力，愿你越发长得美丽而健康！”这略有些荒凉寂寥之感的校园，已然不复往日生机，然而闽江的涛声依旧，陪伴她在这远离尘嚣之地沉沉睡去，谁都不愿轻易地去唤醒她，或许是怕惊扰到她的美梦吧。

协和大学寻踪

池志海 / 文图

我常常向外地朋友和师大校友们介绍福州还有一处秘境——福建协和大学建筑群，得到的回应经常是恍然大悟一般问：是协和医院的前身吗？我总要不好意思地答道：是福建师大的前身校之一，近代中国 14 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这 14 所指的是加入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其余没加入的加起来共 24 所），当然也是这些学校里现

在唯一没有继续使用教育功能的旧址。

这幅《福建协和大学复原鸟瞰图》为本人画于 2013 年夏天，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出版发行，也未曾发布详图至网络，只是拍了一些照片发在微博上。这几年经常有人来询问路线怎么走、还保留几栋建筑。趁此契机，整理了一批图片，读者看完应该对这片建筑群有个大致的了解。



协大现存的建筑官方认定是 11 栋，但我至少找到 14 栋建筑 + 一栋发电站，其他是否还在尚不能确认，但可以肯定当年留下来的建筑基本为洋房建筑，其余木构建筑基本无存。

这片建筑群在靠近马尾的晋安区，地理位置尴尬，因为文物登记在马尾区，但建筑位置现归晋安区，其具体位置就在魁岐村，可在台江元洪城坐 37 路公交到魁岐站下车。到这里首先要横穿一条老铁轨，即可看到这片建筑现有的使用单位——福州制药厂，但开在马路上的大门是不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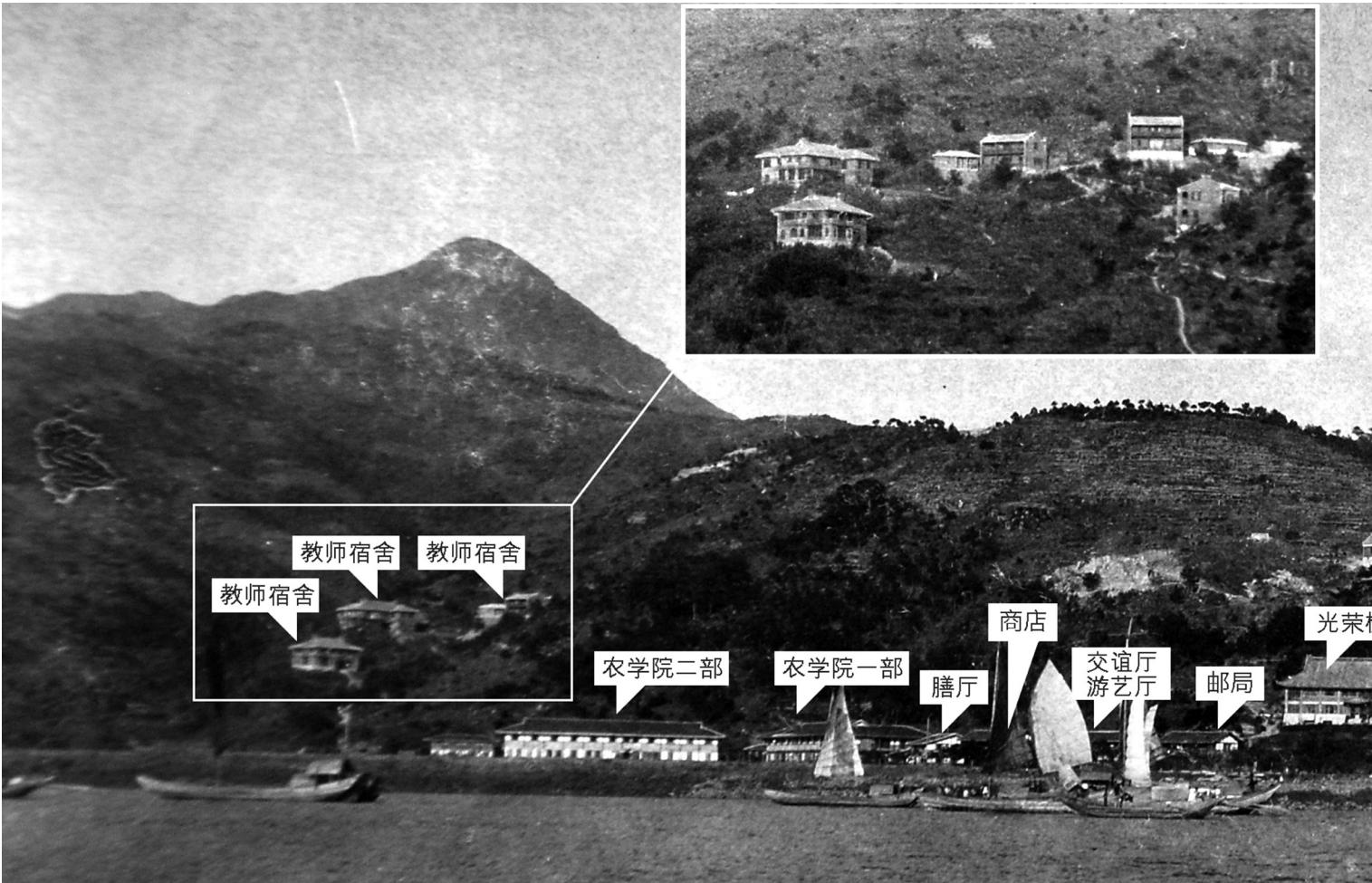
进的，要想进入参观只能从附近居民区边上的小路上山。

根据协和大学当年的老地图、老校友的回忆和实地考察后还原的地图，以及每栋楼的标注，我绘制了一些地图，画好后也给老校友看过，似乎没提出什么意见。可能某些楼在不同时期有过不一样的称呼，虽不能逐一考证，但能保证所标注名称是该建筑曾使用过的名称，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如图中标注有误也希望读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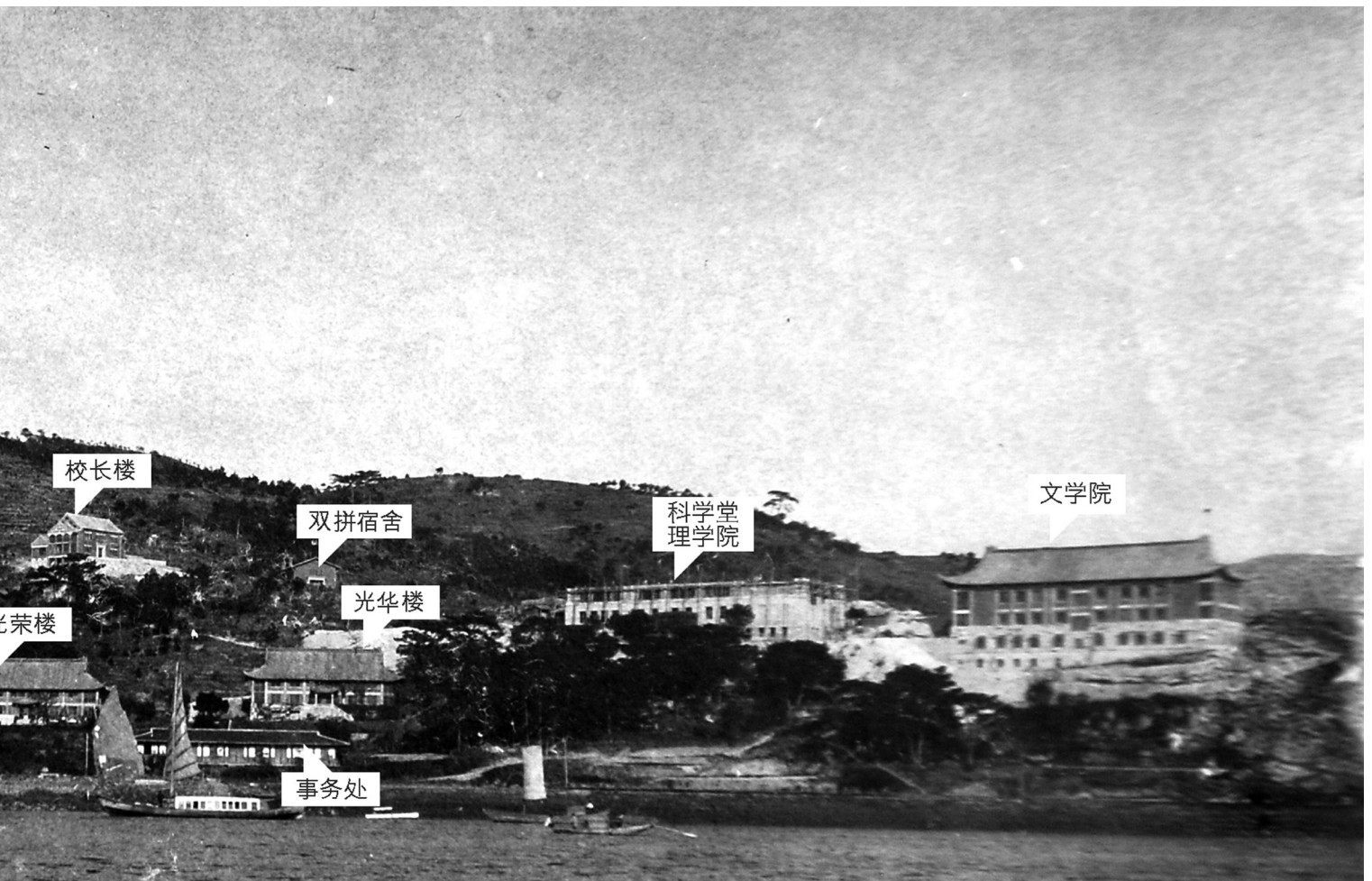


福建协和大学魁岐校区今昔对比





光国楼男生宿舍今昔对比



福建协和大学全景老照片（福建师大档案馆藏 / 池志海 标注）

最后的北洋军团

李海涛

1926年冬，一支军容整齐的部队正沿着漳福公路向省城福州疾进。是年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并与北洋直系吴佩孚、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在贺胜桥和汀泗桥大败北洋军队。为挽救败局，孙传芳委任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率领在福建的6万北洋军队进攻广东，以牵制北伐军的进军步伐。但广东战役很快归于失败。损兵折将的周荫人逃到南平。北伐军乘势攻入福建，主力直趋福州。9月，周荫人电令在漳州的第一军迅速回防省城福州，并接管福建全省军务。第一军军长张毅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到了。他在漳州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宣布了周荫人的电令，并作全军行动部署。之后，他分别电告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和驻马尾的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要求他们积极配合第一军回防福州的军事行动。会后第3天，全军即沿江东桥、角美、同安，向福州运动。由于道路狭窄，万余人的大军，只能排成一路纵队顺序行走，往往先头部队

凌晨2时出发，断后部队直到七八时还无法动身，加之辎重过多，行进速度十分缓慢。

由于第三军溃败，曹万顺、杜起云部起义，第二军军长刘俊阵亡。张毅统领的第一军已是福建境内最后一支完整建制的北洋军团了。

张毅和北洋军队是怎样来到福建的呢？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7月1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也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行列，许崇智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但由于仓促起事，各省讨袁军缺乏统一指挥，加上与北洋军队实力相差悬殊，很快就被各个击破。福建在8月9日通电取消独立，孙道仁下野，许崇智逃往香港。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乘机把北洋陆军分别派驻南方各省，以巩固其统治。

1913年11月，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兼南洋

巡阅使刘冠雄率北洋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李厚基部入闽。李厚基率唐国谟、姚建屏两个团连同部分家属约3000人分乘数艘火轮从上海抵达福州马尾港，而后陆续进入各地军营。这是北洋军队进入福建的开始。

李厚基根据袁世凯的指令，采取强硬手段，限制各社会党团的活动。崇尚门阀的北洋政治也不断渗透进福州人的日常生活。

虽然北军平时大多待在军营里，但街面上不时可以看到穿着斜襟大褂、脑后挽着发髻的北方女人在走动。还有军队的后勤人员或牵着骡马大车、或雇人挑着担子在窄窄的道路上穿梭来往。细心的民众已经发现，蔬菜市场上的大蒜很快脱销，而且价格直线上涨。还有一些酒家饭铺贴出招聘面点师傅的告示，菜牌上也赫然出现了肉丝炒蒜薹、西红柿炒鸡蛋、油酥烧饼……还有虎皮丸子、银丝肚为主的河北八大碗。福州城固有的饮食文化、衣饰文化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宣布称帝。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先后响应。紧邻广东的福建成了前线。为了加强福建的军事力量，袁世凯又把北洋陆军第十师第十九旅臧致平部派到福建，归李厚基统一指挥。

袁世凯死后，皖系段祺瑞掌握了中央政权。李厚基通过徐树铮的牵线，投靠了皖系。从1913年到1922年，李厚基独掌福建军政大权长达10年之久。1917年7月18日，段祺瑞任命李厚基

为福建督军兼省长。由于段祺瑞拒绝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同年7月，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为配合两湖护法军的行动，孙中山决定开辟福建第二战场，派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入闽讨伐李厚基。1918年5月，陈炯明率领的援闽粤军和方声涛率领的滇军第一师联合作战，攻入福建，占领龙岩、长汀和漳州。李厚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急忙向段祺瑞求救。段祺瑞于是派奉系王永泉部入闽增援。这样，在福建的北洋军队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分属各个派系，各占地盘，矛盾渐渐激化，李厚基已经控制不住局面。1920年，段祺瑞下台，李厚基转而投靠吴佩孚，令徐树铮十分不满。

1922年10月，王永泉在徐树铮的策动下，联合粤军许崇智部将李厚基赶下台。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智囊，也是一位儒将。徐树铮深谙国学，因在北京曾受业于闽籍文学家林纾，对福州浓厚的国学氛围印象特别好。王永泉执掌福建大权后，即邀请徐树铮到福州视察。徐树铮也想在福建一展政治抱负。不过谁也没想到，徐树铮到福州，第一天，就到花园弄文学家吴曾祺先生家拜访，而且一见面就向他行跪拜大礼，表达对他的仰慕。堂堂北洋大员，这样谦恭地对待一位民间文化人，这件事，在福州坊间引起轰动，各报竞相报道。徐树铮还专门写了《建国真诠》一书，提出在福建设立建国制置府，待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王永泉为此专门召集省议会商议，但却

招致全体议员反对。大家都认为福建地小而偏，民穷财尽，不宜进行大的改革。徐树铮听了不禁以手击案长叹：“闽人让我失望至此！”他无功而返，只好神情怏怏回到北京。

但王永泉尚来不及统一在福建的北洋各部，1922年12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便派孙传芳和周荫人率军入闽，并于1924年3月进入福州。孙传芳就任福建军务督理。王永泉改为军务帮办，其势力范围仅囿于闽北各县。孙传芳收编了李厚基残部，并以武力赶走王永泉和臧致平，将福建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孙传芳在福州过得并不开心。出于偏见，他不喜欢福州人，对前来求见的福州本地士绅一律谢绝。一天，他乘车到东街口三山座菜馆楼上赴宴，在门口，遭遇炸弹袭击，驾驶员和副官受伤。受此惊吓，孙传芳更加深居简出，几乎不跟外界来往。不久，孙传芳即以出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为由，移镇杭州。孙传芳入浙后，将福建军政大权交予心腹部将周荫人。周荫人为巩固势力，大肆扩军，北洋军队的总兵员达6万之众。盘踞漳州的张毅也成为周荫人在闽南的代理人。

张毅是河北沧县人，18岁即加入北洋陆军，1913年随李厚基部入闽来到福州，由于他机灵聪明，颇得长官喜爱，1915年被保送到福建陆军随营学校学习。1917年毕业后即在李部由排长、连长直升至营长。1922年闽粤战争爆发，李厚基部溃败，张毅不仅很好地保存住自己的部队，而且收容了溃散的北兵2000余人，并趁乱进占漳州，

成为旅长。在与地方军阀的混战中，张毅知兵善战，其部不断扩大。1923年，孙传芳为巩固福建，委任张毅为厦门镇守使兼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不过，这时厦门全境为北洋海军所盘踞，张毅根本无法染指。但一心想坐大的张毅，于心不甘，一直将一面“厦门镇守使”的空招牌，挂在漳州的“福建陆军第一师”牌子的旁边，同时，不断干预厦门政务，这也造成了张毅与海军方面的尖锐矛盾。

张毅把漳属辖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委派各县县长和税务人员。由他委派的县长，都是与他关系亲密的清一色的河北同乡。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百姓横征暴敛。他并鼓励开烟馆、赌场、娼寮，为增加税收，还强迫农民种植烟苗。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张毅大肆增募兵员。他不信任当地人，招募对象以北方人为原则，而且首选河北人。因此，张毅的陆军第一军，可以说是纯正的北洋军人部落。

现在，损兵折将、计穷势蹙的周荫人，要张毅代他收拾残局，这正中张毅下怀。踌躇满志的他，并不满足于只当一个闽南王，他早就觊觎福建全省的军政大权。虽经多场战斗，目前，他统率的第一军，战斗减员不多，建制基本完整，而且弹药物质充足。他认为，只要精锐的第一军迅速开进省城，接管在闽各支部队，统一指挥军事，并联合海军，扼守沿海港口要塞，福建局势依然可控。

于是第一军马不停蹄，目标福州，路上即便遇上小股民军袭扰，也仅是以炮火驱逐，而不追击。何应钦率领的北伐军则紧随其后，双方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按照原定计划，第一军应该在第11天，最迟第12天到达福州。但军队进到晋江安海时，天降大雨。道路中断、桥梁被毁。不得已，张毅下令工兵快速修路架桥，各部队则在马路两侧露营等待一天。

然而就是这宝贵的一天，最终让张毅的第一军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天，第一军进抵乌龙江南岸。先头部队已经征集到数十艘木帆船，张毅下令全军顺序渡江。上午9时许，董胜标旅作为前锋部队先行登船。乌龙江虽然江面宽阔，但江水还算平缓。董旅3000多人渡江十分顺利，很快就在对岸建立了阵地。不料，这时，江上驶来两艘海军快艇，向南北两岸的北洋军队猛烈炮击。同时，又有两架海军的水上飞机在乌龙江上空盘旋，用机枪向地面扫射。这突如其来的阻击，大出张毅的意料。惊慌失措的张毅当即下令部队暂停渡江，就地隐蔽。紧接着他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张毅分析说，这应该是海军和李生春他们不乐意我们进福州才来这么一手。毕竟，海军上下都是福州人，这里从来就是他们的地盘。现在福州有事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会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情况不明，如强行渡江，势必遭海军继续阻击，损失

必大，而且后头又有追兵。为保全实力，建议改道北上，早日与周帅会合。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渡江，陈兵江岸，进迫福州。海军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我们抗衡，如李生春反抗，则迅速予以消灭。张毅踌躇再三，最后说：“当下福州一定有问题，如勉强渡江，必遭多方夹击危险。我军孤立，难操必胜。不如全军北上，保全实力为上策。”

张毅于是决定改道，由南通过浦口到永泰。次日清晨部队出发，由于缺粮，全军上下均在沿途田里挖掘番薯充饥，因此行军速度缓慢。经过一天跋涉，薄暮时分进入一片山地。

司令部里的一些士兵开始搭营帐，生火做饭。但张毅的心情依然沉重。副官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指出军队当前的位置是在瓜山。瓜山，一种不祥的预兆，顿时袭上张毅的心头。这位熟读历史典籍的北洋战将，当然知道，部队已经深陷险境。750年前，就在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血战。

那是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攻陷宋都临安。益王赵昞、广王赵昺等人浮海南下到达福州。是年五月在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拥戴下，赵昞在福州即皇帝位，史称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十月，元兵攻破邵武、南剑州逼近福州，福建制置使王积翁、福州知府王刚中变节，开城投降。危急关头，陈宜中、陆秀夫召开殿前会议，决定“一帝一王”分路突围，一路由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端宗自林浦由水路乘船出闽江口

逃往潮州，另一路由秀王赵与樾和陈文龙等护送广王赵昺由陆路取道水南（今南通）、方山，南下到广东。不料，由南宋降将李恒率领的元军进展迅速，自陆路撤退的宋兵在瓜山被元军追上，秀王赵与樾和陈文龙率部与数倍于己的元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赵与樾阵亡。陈文龙于血战中夺路护送赵昺越过方山突出重围。

想到这里，张毅心头不禁一阵抽搐。他下令部队抓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一场血战。

第一军能顺利走出瓜山吗？果然，翌日清早，警戒的哨兵就发现大批敌军正从两侧包抄过来。由于张毅早有准备，双方激战4小时，敌军退去。清点战果，俘获对方官兵200多人，其中有海军陆战队参谋长萧崇礼和一批军官。从俘虏谈话中得知，海军确实已经归顺国民革命军，而且城防司令李生春也已易帜。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各部，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正计划在瓜山对张毅所部形成合围。

张毅知道，决定这支北洋军团最后命运的时刻到了。闽侯瓜山，时隔750年后，将再次成为血战之地。

初战胜利，并没有给张部带来些许喜悦。张毅大军万余人在瓜山地区被困已经4天。由于在北洋军队到来之前，当地民众已经纷纷逃亡，军队得不到粮食，早已断炊。饥肠辘辘的北洋士兵，艰难据守在阵地上。在数度攻防中，不断有士兵受伤。伤兵的痛苦呻吟声，也严重影响着军队的士气。

当山岭间的暮霭越来越浓厚，原先炽烈的枪炮声渐次停歇下来。张毅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此时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对前景都不乐观。随着战事持续，现在，张毅和近万名北洋士兵已经面临被包围、被分割的局面，大家心里都明白，由于粮饷无法解决，部队能坚持多久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一味抵抗，等待他们的将是全军覆灭的命运。

张毅神情黯然地做出最后决定：“海上运输到现在没有联系上，这条路是靠不上了。粮饷困难、伤病号无药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胜者降于败者，史例未有。但为了保全我军将士的生命，现在只好选此下策。我决定派人向何应钦接洽改编。”

何应钦收到张毅的亲笔信后派十四师副师长卫立煌到瓜山，主持改编事宜，将北洋士兵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分散编入东路军各部队。张毅在部队被受编后，自己只身去福州见何应钦。

张毅终于走进了他朝思暮想的福州城，但这次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威风凛凛的卫队，而是形单影孤，不胜凄惶。而随着他率领的军团在闽侯瓜山覆亡，福建从此结束了北洋军人13年的统治。

这一段曾经的记忆，已然褪色，很少有人会再提起这些。但肉丝炒蒜薹、西红柿炒鸡蛋、虎皮丸子……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福州百姓们餐桌上的家常菜。

以茶为业的洪氏家族

郑芳

2005年3月25日，79岁的洪植城老先生带我们去看位于福州江滨路苍霞洲附近的一栋老宅

子。这栋4层楼的宅院曾经占地3亩，没有中式宅院的进、厅结构，西式的楼房划分为工厂、仓



福胜春茶行旧址

库、实验室、住宅4个部分。如今宅院已经做了同春医药公司存放医疗器材的仓库，靠近路边的一部分因为马路扩建被拆掉，未修整平的残垣处还清晰可见是一般墙壁4倍厚的外墙切面，因为结构牢固，这栋房子一度被用作躲避轰炸的防空洞。屋内的梁上仍然保留着建房时特意设计的木条，目的是方便存放茶叶。南面的居住部分，则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空中小花园的残景。

这栋修建于1930年左右的西式住宅，在当时商贾云集的台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那是当时苍霞洲一带最大最高的楼房，据说建楼房的砖都是从国外运回来的。

这栋宅院的主人是福州市《台江区志》中记载的“刀牌香烟洪家茶”中的洪家。只是，这是关于洪家的仅存记录。鼎盛时期在福州拥有怡和、洪春生、福胜春三家大规模茶厂的洪家，早已成过眼云烟。因为曾经主要做外销生意，福州已经没有人知道曾经影响了中国茶叶行业标准的茶叶巨头。如果不是看到这栋保存下来的房子，很难想象福州曾经有这样一家大规模的制茶世家。

从兼营航运到专营茶叶

在创造洪家商业集团的四代历史中，洪家子孙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条祖训——从商不从政。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任何商业史上，“权”与“贵”的关系如同唇齿。其实，在洪

氏的早年家史上，为官者不在少数。洪家的第一位商人洪天赏在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的当时提出这一家训不无道理，只是这一家训在让洪家子弟避开政治风波，专心经营家业的同时，也让逐渐壮大的洪家生意失去了获得政府保护，更快发展并成为民族资本大家的机会。

洪氏祖籍金门，在其700多年的家族史上，洪天赏是第一位来福州创业的。因为早年做航海船员的便利，他兼带做些南北土产的生意，随航船往返于金门、厦门等地。不久，洪天赏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浮两天后得救，这使他决定退出航运事业全力经商。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清朝末年，外有列强海盗，内有贪官污吏，社会极其动荡。洪天赏在此时嗅出专营商品的资本之味，于是开始分析如何起步。当时，茶叶、木材、笋、纸是福建的特产，而茶叶居首位，一家小规模、手工作坊式的茶厂就在福州台江一带诞生了，这家店成为日后洪家庞大茶叶制售链的雏形。

洪天赏开始专营茶叶生意时，他的儿子洪发绥已经16岁。这个刚成年的年轻人不但聪明好学、才智过人，而且颇有几分心计，在他还没进自家茶叶厂涉足经营时，便以学徒的身份在附近几家大型的茶叶作坊学艺。几年后，制茶技艺胜过老行家。

作为福州茶叶产业化的发起人，洪氏家族体现了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曾经在同行还不知道中国之外到底有多大的时候，就将洪家的茶叶送往世界博览会，并从那里捧回一枚银牌奖



福胜春旧时茶包装



福胜春早期茶庄商标盒

章；他们成立研究室和机械化生产筹备策划组，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手工与机械化生产相结合的茶厂，而洪家茶叶厂也因为独一无二的机械化厂房，一度成为政府拍摄电影的基地。

洪家的研究室还利用制茶过程中茶碎茶末，提炼出各种食用的花香精和茶精，计划生产制造各种即冲即饮的方便茶，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袋泡茶。由于洪家的茶叶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其价格和质量等级一度成为行业标准。据说，若不是赶上接二连三的动荡期，洪家茶也许早就进入美国市场。据洪植城回忆，在其父亲管理洪家茶叶的产销时，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曾经派人上门联系过把洪家茶叶销售到美国的事。

作为民族资本家，洪氏家族在福州商界的尊贵地位也日益彰显。洪家家业的二代掌门人洪发绥因为规模庞大的生意、不错的商誉以及乐善

好施的性格，一度被推选为福州商会会长，后因行事低调，退居常务委员位置。福州第一次沦陷前，日本人为了控制当地商业，一度试图找人劝说洪发绥进入维持会，洪家为避开匆匆去了香港、鼓浪屿。由此可见洪家当时在商界的地位与声望。

洪家生意的几任接班人

在洪家茶叶生意的发展史上，除洪天赏的创业外，洪家之后两任接班人的更多意义在于扩展茶叶生意的枝蔓。

1902年左右，从外姓茶作坊学艺回来的洪发绥跟随父亲发展洪家茶。这是洪家家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其执掌洪家生意期间，洪家茶的市场逐渐扩大。尽管随后中国茶叶公司、扬子公司



洪发绥与儿子在江苏无锡考察市场时的留影

等官僚资本插足福州，民间工商业受到挤压，本地茶叶经营一度陷入困境，不少小茶厂或改行或倒闭，但洪家茶仍在困境中发展。洪发绥的日记中曾经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终结账自有资金621万元（不包括不动产及上海康元厂、福州电灯厂股票等），超过经营所需资金，应谋扩大经营或另谋资金出路。”

如洪家后代洪植城所言，“一个家族企业可以发展，必定会有人有专门的才干”，洪发绥这方面的才干表现得尤其明显。日后接班并在商界风云一时的洪植城父亲洪汝方，时常和他的孩子们谈起：“我不如你们的祖父。”

洪发绥似乎天生具备生意人的精明基因。他思维清晰，行动干练，经常能准确无误地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据洪家后人回忆，洪发绥常常一边接待客人商谈业务，一边接电话处理业务，一

边回复商业信函。他对数字十分敏感。在洪家茶工厂，每天都需要称量花制茶，这个头脑灵活的商人经常自己完成这项工作。称量时，他不用笔记，不用算盘，就能立即口算出应付多少钱，与旁边伙计计算的丝毫不差。

设计独特的洪家茶楼也能显现这个商人的出众才能。洪家茶楼的天花板分为两层，里层为玻璃材质，外层则是可以推动的木窗，通过移动木窗调节的光线，辨别样品

茶的品质。这样的茶楼在当时的福州是独一无二的。

洪发绥的另一过人之处在于善于识人。这位洪家老板有8个儿子，在这几个儿子陆续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已经为性格不同的儿子们选择了适合各自发展的位置，除开养病的、脑子不好的、想继续读书的。他看长子汝端性格沉静，便将家业中的家政和房产部分交给他管理；性情活跃的四子汝正则负责洪家企业的对外交际事务；观念保守、行事谨慎的五子汝直获得了财务会的职务；思维开阔的二子汝方则担起了家族企业中产销经营的部分。

巨商后人的日常生活

在洪发绥的8个儿子中，次子汝方继承了其

识人的能力。这个豪爽、好酒、善交际的商人，对于自己的几个孩子虽并未手把手地调教，但潜移默化中的影响足以见其用心良苦。

洪植城，洪汝方的长子，1926年出生于福州。这个洪家的长孙虽然一直在学校读书，并没有机会真正介入家业的管理经营，但洪汝方早已将他定为洪家事业的接班人。

1945年之后，洪植城进入厦门集美念高中。这个年少的洪家少爷往返厦门的交通工具是飞机。20世纪40年代，汽车这样机械化的交通工具才成为中国普通大众对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与寄托，而飞机往返厦门这样的方式，机票这样的交通费用绝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承受得起的。在洪植城不多的福州同学里，也只有他能够这样来回。据

说，当时单程机票价格是一钱多黄金。当然，这里更值得一说的是洪家为后代传输商业基因的方式。实际上，洪汝方当年也只是支付了儿子第一趟往返机票，之后的交通费基本都靠植城自己赚回。至于怎么赚钱，洪植城老先生回想起来似乎也并不难。洪家在厦门有众多的生意伙伴，洪植城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买黄金带回福州卖，不用立刻支付现金，只需要开一张支票，对方日后可以带着这张支票找洪家兑换现金。福州和厦门的称有新旧区别，一两黄金的差价与往返厦门的机票钱相当。

在洪植城老人的回忆里，尽管当时洪家家业已经出现颓势，尽管洪家的勤俭祖训一直严格承袭下来，但洪家植字辈的生活，仍然优越得让一



洪发绛 50 诞辰纪念合影

般人家的孩子艳羨。当校园里的多数学生还在以拥有一支国产的“民生”牌钢笔为满足的时候，这个洪家少爷正在用着正宗的“派克”笔和同是舶来品的航空手表。

同样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是晚自习后的小点心。局势动荡时的经济危机，让学校里的学生困于简陋的食堂伙食，而洪植城时不时的点心宴则让他成了同学中的明星。

战乱中“洪字茶”的颓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当年10月，日军入侵福建沿海。福州市场陷入极度混乱，商店昼夜开，有钱人家和政府部门陆续迁往南平、永安。

洪发绥也带着洪家大小迁往当时是万国租借地的鼓浪屿及香港等地。福州的家业只剩下汝方一人打理。此时，洪家在十四桥附近购买的原计划用以建设机械化新厂的百亩地，也因为战争影响而搁置。

1943年，从鼓浪屿回到福州的洪家像其他家族企业一样，已是元气大伤，资金不足，难以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此时洪字茶的年产量已经不到1万担，各种形势的变化让洪家的经营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销往省外的茶叶，茶款没法及时汇回；法币开始贬值。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国民政府以增发纸币维持开支，法币继续贬值。洪家资本在国民政府的几次货币变更中逐渐流失。至1948年，洪家茶叶年产

量只剩下3000多担。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洪家企业开始以自营为主，代客加工为辅。

1946年，洪发绥去世。为适应当时的市场变化，洪家兄弟决定采取快进快出的多种经营方式，按个人所长各自分业经营。当时，看到农村普遍缺少肥料，洪汝方开始兼营建丰豆饼厂及胜春仓储公司；洪汝端则在福州下杭路上开办了一家建平商行，开展代客代理业务；汝正、汝直两人成立了一家宏发茶行，业务转向广州、香港、台湾。

只是，洪家兄弟试图重振家业的梦想最终并没有实现。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8月17日，福州解放。一夜之间，之前流通的银圆券成为废纸。海峡两岸断航，福州与外地的来往隔断。洪家原已运往广州、香港、台湾、南洋一带的茶叶和其他货物，在战乱中无人管理，落得个钱货两空、血本无归。从此，洪家盛极百年的茶叶生意已到濒临破产的境地。此时，洪家的生计只能靠厂房、店屋的有限租金维持。

新中国成立后，在校读书的植字辈洪家子孙陆续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资收入逐渐成为洪家的收入来源。1955年1月20日，从国民党台湾飞机上投下的燃烧弹，在台江区烧掉大片房屋，洪家在坞尾占地9亩的洪春生厂房、住宅、家祠，以及在江滨路上一栋三层房屋、台江路上几处出租的店屋都化为灰烬。洪家关于茶商的家族史也在此画上句号。

镇海楼： 时间之外，无人能为你加冕

金麦子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突然从家里的一扇窗口，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楼宇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以为出现了幻觉。定睛细看，我的精神立马为之一振——从方向上判断，它立于屏山之巅！这座神奇地出现在视野中的楼，应该就是传说中一直存在、现实中刚刚完工的镇海楼。

然而，第二天的新闻并没有任何镇海楼的消息。现在回想，那一夜的灯火，应该是镇海楼即将竣工之前的试亮灯。因为不久之后，即2009年初的某一天，各路媒体争相报道镇海楼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我幸运地得到镇海楼的眷顾，在它未揭开面纱之前，让我得以“遇见”，在黑夜里，在突然间，先睹了它迷人的姿彩。

镇海楼的这一次隆重亮相，是它历经600多年风雨沧桑后的第十次重生。

从明洪武四年（1371）初建，到1970年的拆毁，这600年的时间里，据可查阅的资料显

示，大修建九次、毁了九次：三次遭雷击、两次失火、一次被大风吹倒、两次因年久失修倒塌，最近的一次是1970年的人为拆除。

镇海楼因何而来？为何屡毁屡建，绵延屹立几百年？它对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

让我们把历史紧紧缠绕着的线团缓缓解开。洪武三年（1370）三月的一天，明太祖朱元璋上朝，处理了几件重要的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委任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也就是派这个女婿到遥远的福建兼任最高行政长官。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他殷殷叮嘱、谆谆教导，话意大概如是：福建这个地方，原本富庶，由于元末的弊政，民生被削刮过度，现在尚未复苏，今天委命你去那里安定一方，安抚百姓，你千万

不要仗着自己是皇亲，而生骄纵之心，做骄纵之事，贻害百姓。你要谨守人臣之道，秉公执法。如果你做不到，那我决不会违背天下公议而放过你！

明初期的驸马，皆授予驸马都尉职，地位高超，直接越过品级，列于伯爵侯爵之间。位高而责重，驸马都尉是群臣的表率，在关键时刻要典兵出镇，或掌府部事，有时也要执行临时性的派遣任务。驸马王恭兼任福建行省参政，就是一个临时的派遣。

我们不免好奇，这位即将到福建来的驸马，是个怎样的人物？

这还得从明初如何选驸马说起。

朱元璋时期的驸马，多是“勋戚子弟，资貌洁修，仪正详谨”，就是说，尊贵的驸马爷，多出自文武勋臣之家，从相貌到品行都要经得起严格考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驸马王恭那仪表堂堂、文才武略的模样。

朱元璋派他前往福建，心中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不辱使命、抚绥一方。

在到福建之前两年，王恭就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一举平定了浙江的兰秀山反明武装。他对东南沿海的形势了如指掌。兵镇福建后，正值泉州府惠安县陈同作乱，占领永春、德化、安溪三县。泉州卫姚得、龚胜等率兵讨伐，败下阵来。指挥周渊又督兵进击，还是战败。于是，驸马都尉王恭亲自率兵征讨，大获全胜，并活捉贼首陈同。从史籍中对这两次战役简洁有力的叙述，我们可以一窥王恭不同凡响的将帅之才。

王恭于朝堂受命后，日夜兼程到达福建。此时的福建首府福州，经受了元末的腐朽统治，加上连年的天灾、战乱，已是百业废弛，民生凋敝。他目睹着百废待兴的一切，看到连年征战已



毁坏殆尽的城垣，心头涌起的最为急迫的事，就是筑城墙。在那样的时代，作为一个率领过千军万马征战沙场的人，他最明白，坚固的城墙就是最有效的防御外敌入侵的工事，同时，威武雄壮的城墙本身，也是威严统治的象征，具有现实的威慑力。

从这一刻开始，王恭的名字，就与福州城墙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二

在王恭到来之前的1500多年间，福州历朝历代也都在不断地修建、改建、扩建着城墙。

最早的记载，是在闽越王无诸时期，先人们在越王山东南麓冶山一带筑城建都，称冶城，这是福州的城垣之始。当然，限于生产力水平，那时的城墙，是用黄土夯筑，冶城可谓一座土城。城里住着王族、官吏和守城的士兵，一般老百姓住在城外。位于冶城之北的越王山，当时古木参天，羚鹿相逐，美得像一道碧玉妆成的屏风，每到冬天，还能为冶城挡住北面来的寒气，由此，人们把它形象地称为“屏山”。闽越国严禁在屏山樵采，有效保持了森林的原始状态，涵养了丰

富优质的水源。屏山成为冶城的风水宝地，也成为未来福州城市文化发祥的摇篮。

此后，福州古城在筑城、毁城间轮回了几次。冶城毁于汉武年间。后来，晋武帝在闽设晋安郡，郡守严高建“子城”，规模比冶城大。

唐王审知筑“罗城”，把子城围成了内城。后又筑南北夹城，罗城进一步扩大。

宋初，赵家王朝顾虑南边有反，下令废毁城垣。

宋熙宁年间(1068~1077)，程师孟知福



州，动工修建福州城。这次的修筑，规模超过了以往，成就了福州历史以来最大的一座城池。城上建楼阁9座，同时疏浚内河与护城濠，架桥12座，使福州形成了“山在城里边，城在水中间”的独特美景。

不幸的是，这些美好的筑城修垣工事，在元末再次被废毁。

历史走到了明初驸马王恭镇福建时段。

1371年，王恭开始了他生命中也许并不算太耀眼、但对福州影响深远的重要工作——筑府城。

我们已经知道，王恭是个军事家，他对筑城的考虑，首先有利于军事防卫。福州古城建设，自北向南形成南北中轴线的格局。城北为屏山，海拔仅72米，可谓无险可守。王恭英明决断，将福州城墙的北段从以往的屏山脚下，延筑到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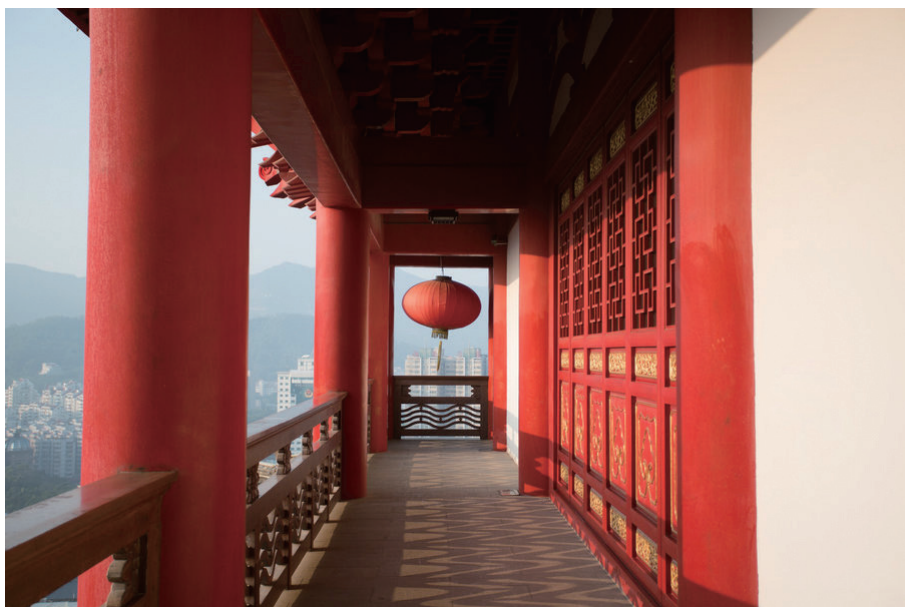
上。这不仅可为城北设置一道人造天险，而且站在屏山之巔的城楼上，即可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有利于审时察势，攻守自如。

往南，则把乌山、于山环抱于城墙之内。府城广袤方圆十余里，由接近圆形的城墙所环绕，其道路水流，均体现藏风聚水的原则。按传统的说法，这样的规制，风水奇佳。明代时人对福州府城就有高度赞誉，王世懋在他的《闽部疏》中生动描述过：天下城市，最好辨认的莫过于福州。群山罗抱，小山坐落于其中，乌山、于山东西相对。城外，东面是鼓山，海在鼓山之外；西面山岭迤邐，像展开的旗帜，称为旗山。东西旗鼓相配……在城内登乌山远望，闽江、乌龙江，历历在目。山川如此明秀，实在难得……明人王应山在《闽都记》中也是类似表述。

王恭的“府城”建成之后，福州俨然成为天造地设的人间福地。

三

那时，刚刚建于屏山城墙上的城楼，还不叫镇海楼，它叫样楼。王恭对这座样楼的设计是颇为上心的，他参考了福州威武军门以及皇朝内一批先进的城门楼，借鉴了各地



城楼的优点，精心修建了这座“样楼”。之所以称“样楼”，就是要让府城的其他各座门楼，皆以此楼为标准样板。

因为有样楼的存在，屏山也被称为样山。

当样楼建成的那一天，我们想象着，王恭意气风发，携众登临。眼前稻浪层层，随风起伏；四围河网交错，渔舟点点；极目远眺，晴沙万顷，浩浩闽江奔来眼底；更远处喜茫茫广阔无边，在那里，闽江奔腾入海……我们不知道王骞马站在全城的制高点上，心情是否澎湃如潮，是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可以知道，此时，镇海楼四面吹来的风，也一遍遍吹拂山脚下这座吉祥的府城，滋润着这方有福之州。

那时的人们，站在样楼上，可以看到极远处的闽江入海口，同样，即将入港的船只，遥遥可望府城制高点的样楼——它那么醒目地突出于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从建成之日起，便成为进出闽江口航船的“准望”，即使雾气笼罩，抑或夜幕降临，航海者都可以凭着样楼的灯火指引，找到进港的方向。

正因为如此，这座样楼一建成，就与大海，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因为福州城历来多受台风侵扰，那个时代的低矮木构建筑，常常在肆虐的风雨中，倒塌倾覆。而城北山巅上的样楼，以大石砌成，坚固伟岸。人们从府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仰视它，一次次目睹它在风灾雨祸中屹立的雄姿，渐渐地，它就被赋予了神力，先人们认为它不仅掌控着海陆交通，更具有镇海之功！于

是，样楼的“镇海”之名，不胫而走。“越王山拥海潮流，山上嵯峨镇海楼”，诗词歌赋一时传扬，镇海楼之名即为天下认可通用。

历经600多年岁月洗炼，镇海楼，早已不仅是一座楼，它更抽象为一种符号，一个充满意味的象征。后来的屡毁屡建，都在形制上沿袭着最初的标准，它就像一个不可替代的基因，永远植入到福州的精神内核之中。

2006年的重建，平面尺寸依然按旧制，只是根据屏山周边楼宇的建设状况及山形的略有变化，为再现镇海楼当年屹立于屏山之巅的宏伟气魄，而把基座提高了10米。新时代的镇海楼，是更为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吸取了古建筑中诸多美的元素，外观为歇山顶加腰檐、城门式高台二层楼阁，雄伟壮丽。城楼朝南面的匾额上，“镇海楼”三个大字，苍劲峻拔，这是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字迹。匾额正下方的台阶中间，置一幅巨大的高浮雕石刻“双龙盘海”——两只栩栩如生的巨龙压着翻滚的海浪，“镇海”之意，韵味深长。

当你走到镇海楼西侧，会被一组排列成神秘图案的石缸石柱吸引。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缸卦阵”！是镇海楼几百年来“必配件”。七口石缸按天象上的北斗七星方位图排列，成斗勺状。古人以为，斗勺盛水，可伏火灾。古代的福州，房屋多为木构，经常发生火灾，“纸褙福州城”之说，形象而悲情。对古人而言，水火之患皆猛于虎，防火与镇海一样重要。他们认真努力

地对抗天灾人祸，把伏火之阵摆在镇海楼旁，是他们认知范围内的切实必要。现如今的设计建造，依然保留七星缸卦阵，这一用心，是向历史致敬，向先人致敬，也是以实景再现的方式，讲述镇海楼无数动人故事中的一个。

四

现在，你如果走进镇海楼，还会发现，它

拥有一个令人惊诧的巨大“地宫”。这个地下空间，就是由特意加高了10米的镇海楼的基座而产生，它被独具匠心地设计为“名城馆”——集中展示福州2200多年历史文化的现代化高科技展馆。在这里，你可以从巨幅的3D投影屏幕中、从地面上井然有序的实体模拟社区间、从墙上的软木画和油画里、从玻璃地面下的模型中，直观地看到福州千百年来的建筑变迁史、城市演变史、文化演进史。





镇海楼老照片，可见城墙和七星缸



现今仿制的七星缸

在这个现代化的多媒体展示馆，当你看着冶城的土城墙，看着府城中屏山之上的镇海楼，看着古老的安泰河边市民们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景，看着惟妙惟肖的鱼丸老铺……你的脚步忍不住要停下来，梳理一下自己正在穿越千年的纷纷思绪……

从名城馆走出来，带着神奇福州的历史文化之魅在心中的阵阵回响，你拾级而上二楼的观景台，此时，偌大的福州城在眼前豁然开朗。

“群山罗抱”的景象依旧在，只是眼前无数的高楼大厦与纵横交错的路网，让远山更远，黛色如烟。闽江依然在浩荡奔流，只是站在这里，我们的视角已不能与它相接，可它知道，它所养育的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正在前所未有的富庶

丰饶中，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更多美好奇迹。

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幸运，和镇海楼站在一起！它跨越 600 多年的时光，携带着历史的诸多见证，它凝结着千万人的智慧、审美与情怀，寄托着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海晏河清的平安世道的向往，对风调雨顺的美好生活的祈求……面对它，我们似乎找不到足够恰当、足够厚重的词语，以匹配它的熠熠荣光，我们的每一句赞美都显得那么清浅无力——是的，除了时间，谁还能为它加冕？

我与庄严宏伟的镇海楼站在一起，在阳光下，在星光下，俯瞰有福之州，正天地澄明，春程万里。

铸龙高士

余 暇

高凤岐之死

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一个春日，北京琉璃厂厂甸附近的胡同口围聚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一支官府送泥金帖的报喜队，边敲锣打鼓边大声通报：“高凤岐老爷高中，名列榜首。”一位中年人听到通报兴冲冲出门接过泥金帖，捧在手中，仔细看了一眼，喜极而泪下，而后将泥金帖郑重交于身后的另一位中年男子。走在前面的这位是名托京师的林纾先生，而紧随其后的那位就是高中榜首的福州名士高凤岐，此时正寄寓在好友林纾家中。

高凤岐，字啸桐，出生于1858年，祖籍福建长乐龙门村。光绪八年（1882），24岁的高凤岐，与林纾、严复、陈衍等闽中学子同科考中举

人，他们也因此结为好友。但不知为什么，命运开始捉弄他们。这之后，这几位福州才子在每年的科考中都连连失利，而高凤岐更是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科考已经成了高凤岐的一块心病。

1908年，对大清帝国来说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前夜。外有列强虎视眈眈，步步紧逼，内有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加上各地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朝廷上下各级官员互相掣肘，拿不出治理朝政的有力举措。清廷此时急需治国安邦的人才，而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早于1905年就迫于社会压力而取消了！

所以，这次御史台的人才选拔考试，可以说是清廷的一次新尝试。

清王朝的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监察部，



高凤岐

职责是为朝廷和百姓监察百官。高凤岐认为当下“朝廷病在庶事之不举和言路之不通”，自己若能“入台为御史，则日取天下利病，陈之皇帝，兴利除病，以益国家百姓”，就可以实现自己“近君谏言”的夙愿。因此，虽然御史官阶不高，仅五品，但高凤岐以“为国言事、兴利除弊”为己任，义无反顾进京应试。

这次御史台的考试题目是论说文二则，其一，《兴学论》，其二，《币制策》。高凤岐对教育改革和振兴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有过认真的思考和成功的实践，在考场上他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待到成绩揭晓，果然高中头名。

高凤岐擅长桐城派古文，又颇具维新思想。他曾在福州办学馆“铸龙堂”，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896年，应杭州知府林启邀请，高凤岐携

两个弟弟高而谦、高凤谦（高梦旦）和高足林万里（林白水）一同往杭州协助林启办学，先后整顿改造了传统书院——东城讲舍，创办了三所新式学堂：求是书院、蚕学馆和养正书塾，共同开启了浙江现代教育的帷幕。

1900年，林启太守病逝，高凤岐辞去求是书院总教习一职，到广西桐乡知县方家澍的县衙里作幕。后来被两广总督岑春煊看中，聘为幕府。不久，高凤岐因工作勤奋业绩突出，又被岑春煊推荐任广西梧州太守。高凤岐在太守任上关心民生，推行新政，清义仓、立工厂、兴蚕学、办农林、整学规，视官事如家事，事必躬亲，颇有政声。梧州太守任期届满，高凤岐因劳成疾，辞官到上海家中休养。岑春煊非常看中高凤岐，曾举荐他为桂平道台，被婉辞；1907年岑春煊被调往京城任邮传部尚书，又推荐高任邮传部丞，再次被高凤岐婉拒。

然而，这次御史台侍郎于梅若推荐他参加御史选拔考试，高凤岐却欣然前往应试。

林纾其时在北京五城学堂任总教习，高凤岐到北京应试就住在林纾家里。林纾与高凤岐是非常知心的同年好友，高凤岐性格刚直行事干练，林纾性格温和行事随兴。他们不仅相互仰慕，平时常常诗词唱和，还不时书信来往，聚会作文。在几位福州同年同乡好友中，他们两人的感情最深。高凤岐的篆刻功底深厚，深得林纾喜爱。林纾嘱高凤岐为其篆刻墓碑，高凤岐欣然提刀。高凤岐喜爱林纾活泼生动的古文，林纾也应命为其

题写碑文。

二人关系既非同一般，林纾又是性情中人，手捧泥金报喜帖，反复摩挲，为好友高中头名而高兴，情不自禁，当即展纸研墨作画表示庆贺。

画名《征车过阙图》，并题七绝一首于画。诗曰：

“画里朱楼耸百寻，征车过处柳阴阴。苍梧父老共相忆，不换先生恋阙心。”落款为：“戊申五月，啸桐同年蒲轮入都，朝仪极品入御史台，得假南归，写《征车过阙图》送之。畏庐林纾写赠。”谁知二位好友高兴不过半日，就接到了坏消息，上谕下：“高凤岐，勿记名，不用。”

这无异于给高凤岐当头一棒。自古以来，无论何种考试，鲜有考中第一而不被记名的。在京闽人名流纷纷为高凤岐不平，统统无济于事。后来得知是权臣袁世凯与岑春暄、于梅若有隙，故而关闭了高凤岐进入御史台的大门。

高凤岐遭此打击，回到上海家中即一病不起。正当暑日，高凤岐日夜长咳，时有咯血，夜不能寐。医生诊断为肺病，高凤岐却拒绝用药。二弟高梦旦其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晨昏陪护左右，他知道兄长患的是心病，就多方通知兄长的各位好友，请他们与兄长用诗词唱酬的方式来加以排解。林纾、严复、陈宝琛、郑孝胥、陈衍等闽中好友都纷纷赠诗，表达对高凤岐遭遇的同情与不平。

好友的同情与义愤，虽然给高凤岐带去不少慰藉，但高凤岐的病情反反复复绵延至秋冬仍不见有多大起色，于1909年3月4日在上海抱憾而

终。

高凤岐办铸龙堂

高凤岐读书非常刻苦，其诗文在闽都文化人之间多有传诵，尤擅长篆刻，对古文字的研究也颇有心得。由于科考不中，而父亲留下的家底渐渐掏空，且上有高堂需要供奉，下有二位弟弟需要教养，他遂利用居家院落，开办了“铸龙堂”学馆，一边读书备考，一边收徒住读，收取一些束修来养家糊口。

高凤岐的家在福州北门九彩园小巷的尽头，靠近西湖。那是个三开间的木屋，围在矮墙之内。小院内两株老梅疏朗，数竿青竹摇曳，环境雅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高先生开馆授业，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中西兼顾，深受少年学子喜欢。在高先生的悉心教诲下，不出二三年，入学少年



九彩巷

的文章书法皆大为精进，学问见识也高人一筹，铸龙堂的名声很快传遍福州城。

高凤岐为自己的学馆起名“铸龙堂”，表达了他立志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的自信与宏愿。“铸龙堂”果然不负其名，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人中之龙，其中就有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官高而谦，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家高梦旦，中国报业先驱林白水，福建省立图书馆首任馆长黄翼云，孙中山的秘书黄展云，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会首任会长高鲁。

高凤岐的两个弟弟，都曾跟随他在铸龙堂学习。高而谦毕业于福建马尾船政前学堂第三届制造班，1885年至1891年被马尾船政局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学。高而谦从法国回来之后暂居铸龙堂，一边协助长兄教导学生学习法语、官话（普通话）、数学，一边跟着兄长重温科举考试文章。

高而谦获得举人出身之后，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出任任清政府外务部右参，云南交涉使。宣统元年（1909），任澳门划界大臣。

在澳门勘界事件发生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居住了300年之久。最初，葡萄牙向中国政府租借澳门时，曾签订过条约。该条约虽准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但没有划定澳门界址及附属水陆界线，也没有规定葡萄牙人的居留期限。而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之后则一直不断在附近大肆圈地，扩张其势力范围，不仅侵害到大陆居民的利益，而且绘制了比原先租界扩大了30倍范围的地图，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以及海域的主权要

求，并援引公法称“久占之地，即有主权”。葡人的侵略行径引起广东军民的强烈不满，双方长期纠纷不断。

1908年2月，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向中国口岸走私武器被广东官军缉捕。葡萄牙人跳出来，声称日本人停船的地方，是澳门当局管辖的海域，应该将日本船交由他们来处理。葡萄牙还强调所谓澳门属地及相关水域的概念，要求将问题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来判定，并称将请求英国派军舰到澳门海域进行武装干涉。这引起广东民众的义愤。广东民间相继成立了多个“澳门勘界”组织，广东水师也排舰布兵积极备战，中外报刊媒体对事态的发展也密切关注，不断跟踪报道。“二辰丸”号事件不断发酵，加剧了澳门的紧张局势。

1909年2月，高而谦被清廷紧急任命为澳门勘界大臣，从云南交涉使任上赶到澳门，与葡人展开了关于澳门勘界问题的艰苦谈判。

高而谦曾经在法国学习国际法多年，他一边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一边借民意輿情之声势，遏阻了葡方谈判代表咄咄逼人的气势。由于高而谦态度强硬，最后双方同意维持现状，葡方不再提勘界要求。百年之后，在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上，因为有一系列的历史文件表明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对此葡萄牙没有异议。高而谦当年作为大清帝国的澳门勘界大臣，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也为澳门的最终回归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年一起在铸龙堂学习的还有高凤岐的小



高鲁

弟高凤谦。高凤谦与两位兄长不同，对科举考试没有丝毫兴趣，他一心想编书。编教科书教育少年人，少年强则国强；编文化科普书籍，向大众普及传播中华文化知识，以开启民智拯救中华。高梦旦是他后来自取的名字，据说是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中国摆脱了列强的欺凌，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强民富的国家。梦旦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愿望。高梦旦先是随长兄在铸龙堂学习多年，后来跟随二位兄长往杭州帮助林启太守办学。1900年春，林启太守与世长辞之后，高梦旦携兄长资金，投资上海商务印书馆，并任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部长、董事。高梦旦一生致力于编辑出版事业，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和中國近现代思想启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高鲁曾经在铸龙堂住读，后考入马尾船政学堂读书，1905年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工科博士学位。高鲁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于1909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巴黎同盟



林纾

会。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34岁的高鲁被孙中山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1912年，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教育部接管了当时清政府的钦天监（即现在的北京古观象台）并改其名为中央观象台，高鲁被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任命为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少年时期就对天文学着迷，在巴黎又受到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天文著作的影响，因而对天文学研究充满热情。

192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中央观象台成功举行成立大会，高鲁任首届会长。

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竟邀请法国人创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神父代表中国出席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深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南京紫金山筹建中国自己的大型天文台。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高鲁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但不久，国民政府又任命高鲁为中国驻法国公使。高

鲁无奈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推荐时任厦门大学数理系主任的余青松教授接任其工作。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剪彩竣工。高鲁要建造一座世界水平的天文台的夙愿终于在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余青松的任上实现了。1935年5月，紫金山天文台首次发现一颗小行星，国际行星中心按照紫金山天文台的意愿将其命名为“中国”号。

高凤岐与林社

1895年春，高凤岐兄弟以及林纾、陈衍等几位一起结伴前往京城参加科举“会试”。在此期间，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一起参加了“公车上书”，反对政府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年夏天，高凤岐一行在返乡途中经浙江衢州，专程拜访衢州太守林启。林启也是福州人，因为在北京御史任上，上书反对将海军军费挪用修造颐和园而得罪了慈禧太后，被连降三级，外放衢州。林启在衢州任上大展拳脚，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办教育。林启比高凤岐年长20多岁，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林启当即邀约高凤岐一行一起到浙江办教育，施展救国抱负。

1896年，林启调任杭州知府。高凤岐率二弟、三弟以及高足林白水一行四人来到杭州一起协助林启太守办学。高凤岐性格耿直，作风干练，深得林启太守的信任。他们首先整顿了学风

败坏的东城讲舍，后来林纾结束了自己在福州的教学工作，也来到杭州，任改造之后的东城讲舍山长。高凤岐等人协助林启太守，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之下，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先后创建求是书院、杭州蚕学馆和养正书塾，开启了浙江现代教育的帷幕。

1897年正月十五，求是书院开学，林启知府兼总办（校长），高凤岐是汉文总教习，高而谦、高梦旦、林白水都是汉文教习。外文总教习是一名美国牧师，中文名字叫王令赓。在高凤岐的调度下，汉文教习与外教习密切配合，求是书院很快走上正轨。1902年，求是书院更名浙江大学堂，为现在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蚕学馆后更名浙江丝绸学院，为现在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养正书塾，为现在杭州高级中学前身。

1900年4月，经历了戊戌政变打击的林启，终因积劳成疾，不治去世，葬于杭州西湖孤山。高凤岐建议并带头捐资，在孤山林启墓旁建林社，祭奠林启。1901年初，林社竣工，正式举办了首届公祭仪式。林社里树立了林启的塑像，挂满了杭州名士吊唁的挽联和悼念诗文。孤山林社的创建，为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增添了浓重一笔。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林启先生忌辰即为祭日，由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三校轮值设祭，其他学校学生自动参加，衢州人士也多有参与。祭奠仪式风雨无阻，绵延几十年，直至抗战时期。曾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是养正书塾校友，他在自己的笔记中提到：“余

为养正书塾学生，故余在杭而逢公祭，虽风雨必往与。”

1909年，高凤岐病逝。杭州人感念其与林启太守一同开创浙江近现代教育先河，让其亲友们也将高凤岐葬于孤山。后任杭州知府林伯颖发起捐资，树高凤岐线刻画像碑附祀于林社壁间。后来，林伯颖过世，其子林长民也在林社为父亲树碑祭奠。就这样，杭州林社成为许多闽人的祭祀殿堂。

高凤岐的死，在当时北京、江浙和福建的文人朋友圈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众友人纷纷来电来函，送来挽联和悼念的文章。这些文字对高凤岐的一生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当时文人学者对高凤岐早逝的惋惜以及对腐败当局的不满与批判。高梦旦将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编辑成册，以告慰仙逝的长兄。许多挽辞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

便司献替，遽以毛鷲为能，公等体矣，岂有鸩人羊叔子；直到弥留，犹祝中兴不远，天乎鉴此，可怜忧国贾长沙。

——严复挽梧州知府高啸桐

初政正求言失此方闻真可恨

沉痾犹枉礼规吾徧性最相宜

——陈宝琛挽高啸桐知府

惟其爱国作无聊感遇文章不期抗节惊人
入阁靳君簪白笔

纵我铭幽亦垂老伤心稿本既已效忠无
地埋幽听汝就青山

——林纾挽高凤岐

高凤岐去世之时，其弟高梦旦将噩耗电告正在日本东京学习的好友林白水，嘱林白水为其长兄写作挽联。林白水是高凤岐先生最得意的学生。林白水如约寄回了挽联。

听经溯十五年前，日月悠悠，大难往事长相忆；

闻讣在八千里外，门墙落落，别有伤心未忍言。

夫子大人灵鉴 受业林万里自日本寄挽

与高凤岐最为感情深厚的知交当属林纾。他们生前来往频繁，诗文唱酬很多，高凤岐死后，林纾每年都要写诗作文悼念好友，常常是“旧情潮上如何遣，藏却遗笺更取看”，或者是“尊前还信先生健，地下应知世局难。胜会虽非留影在，国忧到此待谁宽”。悼亡友，忧国难，拳拳之心昭然。有时回忆昔日与好友的美好过往，甚而不能自抑，“恸绝失声还自咽”，如此凡十余年。林纾与高凤岐的交往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和绝唱。林纾留下许多与高凤岐兄弟、与他的学生有关的轶事和诗文。林纾用自己的如椽之笔，为后人编写了闽都一代名师——福州名士高凤岐的生动传奇。

与高梦旦先生的一段交往

胡 适

高梦旦先生生于1870年1月28日，死于1936年7月23日，葬在上海虹桥公墓。葬后4个月，他的朋友胡适在太平洋船上写下这篇文章。

民国十年（1921）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



高梦旦

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我知道他和馆中的老辈张菊生先生、鲍咸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对我的意思都很诚恳。但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



1933年，高梦旦与家人游北京西山留影。左二高梦旦，左三郑振铎，左四高君箴



1931年北京西山。左起高梦旦、郑振铎、胡适、曹诚英

不配做这件事。我很诚恳的辞谢了高先生。他问我意中有谁可任这事。我推荐王云五先生，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后，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一个月之后，高先生就辞去了编译所所长，请王先生继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

民国十九年（1930），王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兵祸

稍定，王先生决心要做恢复的工作。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当那危急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两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绩。

我特记载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自代，这并不奇怪。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

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高梦旦先生，福建长乐县人，原名凤谦，晚年只用他的表字“梦旦”为名。“梦旦”是在梦梦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号“崇有”，取晋人裴《崇有论》之旨，也最可以表现他一生崇尚实事痛恨清谈的精神。

因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因为他崇尚实事，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梦旦先生晚年发表了几件改革的建议，标题引一个朋友的一句话：“都是小问题，并且不难办到。”这句引语最能写出他的志趣。

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他的赏识我，也是因为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锲而不舍的做去，不敢好高骛远，不敢轻谈根本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



民国商务·道林纸精印 高梦旦著《十三月新历法》

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

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能了解人，能帮助人，能热烈的、爱人的、新时代的圣人。他爱朋友，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他爱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学。因为他信仰科学，所以他痛恨玄谈，痛恨迷信，痛恨中医。因为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的最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人都说他冲澹，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热烈，所以冲澹的好像没有自己了。

金鸡山下地藏寺

孙源智



地藏寺大门

中国古时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叫“气”。人们认为天地万物皆有“气”，甚至一座城市也有城市的“气”。福州的“气”便聚集在东郊的金鸡山，据说其祥瑞甚至曾引起秦始皇的忌惮，于是有了《三山志》中“秦始皇时，望气者云此山有金鸡之祥，遂斫断山脊，以压王气”的传说。秦始皇命人斫断金鸡山的地方后来形成一条路，古时称为鸡公弄，据说就是今天的金鸡山路。福建首屈一指的尼众丛林——福州金鸡山地藏寺，就藏身于金鸡山路南侧的琯尾街中。

一、清末重兴的千年古刹

关于地藏寺的历史，或将其追溯至梁大通元年（527）所兴建的法林尼寺，或称其前身为唐乾宁元年（894）兴建的地藏院，或认为它本是后晋天福十年（945）所修建的东报恩院的地藏殿，又

或者将上述这几座寺院当作是地藏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名称。作于1992年的《重修福州金鸡山地藏寺碑记》中就这样记载：“（地藏寺）旧称法林尼寺，建自梁大通元年，原报恩寺之地藏殿也，唐乾宁元年重修，旋毁于火。”但在宋代的福州地方志《三山志》中，并列记载了上述三座寺院，且未提及其间有所传承。由此，碑文中的这种说法或值得商榷。

地藏寺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还要从清季开始。同治三年（1864），邑人魏杰集资重建了地藏寺，让这座湮没已久的古刹得以重兴。魏杰在《甲子春建地藏寺落成有作》中有“盛唐古刹傍

鸡峰”一句，这成为探究地藏寺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这句诗来看，至少在晚清时，地藏寺对于自身传承认同的应当是唐乾宁元年（894）所建的地藏院。魏杰既是此次重建地藏寺的募缘首事之人，同时也是一位在福州文化史上有着一定地位的白衣诗人，因此他的说法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魏杰是清末福州盐商，同时也是当地著名的诗人、藏书家。据说魏杰发达之后，曾在东门塔头街一带广置田舍，清末编修的《闽县乡土志》记载当时塔头街一带“市肆后皆有人家，以魏姓为多”。当地民间还流传有“魏半街”的说法，



天王殿韦驮护法亭

以形容魏杰家族在当时的辉煌。魏杰是个长寿之人，活了有80多岁，地藏寺是他69岁时所倡建。地藏寺所在的琯尾街，连接着金鸡山下的鸡公弄与魏杰所住的塔头街，对于“白马坡前耕种，金鸡山下结庐”的魏杰来说，算得上是一个休憩的好去处。“魏半街”后来因旧城改造而拆除，魏杰的故居迁建到他曾结庐而居的金鸡山，现已成为金鸡山公园中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如今，从崭新的仿古故居上，我们已很难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故居前的《魏杰公略传》碑文中说魏杰是“半耕半读，自学成才”，但从历史留下的记载来看，魏杰应该说是师出名门。魏杰的好友王廷俊在《逸园诗抄序》中记道：“从岩少从龚海峰太守之介弟石梁先生。”其中，“从岩”是魏杰的表字，“龚海峰太守”指的是清代循吏、闽中著名学者龚景瀚，“石梁先生”即龚景瀚四弟、魏杰恩师龚景淙的雅号。龚氏一门在明清两代共出了6名进士，其中还有一人状元及第，是名满榕城的书香望族。龚景淙是乾嘉时期的福州诗人，他一生科举不顺、屡试不第，于是寄情山水，留下了不少诗篇。

或许是受到了授业恩师的影响，或许是出于本性中对山水田园的热爱，魏杰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选择仕途。终其一生，他都并未考取任何功名，却于山水间怡然自乐，颇具隐士之风。他自叙其“少抛儒业，素习野人”，以“拙夫”为雅号，访道寻僧，“终优游以养拙”。魏杰诗风简淡，经常能自得其乐地去发现极其平凡的自然

美，笔下所描绘的也多是恬然的山水田园风光。他作有一首名为《题金鸡山馆假山》的诗：

金鸡洞壑白云间，围住真山当假山。
五岳匡庐常到眼，免携杖履远跻攀。

这首诗题刻在地藏寺大殿后的一块岩石上。当年魏杰等人重建地藏寺时，借这块天然岩石营造了“假山”景观，以真为假，别有意趣。现如今，这里古樟参天，花木环绕，依然不失为地藏寺中一处别致的景观。这座规模并不算太大的地藏寺，也一如魏杰的诗一般，简素、平淡，同时



追思亭

又不乏细节处的雅致。

二、舍身度人的地藏菩萨

从魏杰重建地藏寺到今天，已经又过去了150多个春秋。位处喧闹的居民区中间，独属于地藏寺的红檐黄墙显得分外醒目。由于空间所限，地藏寺没有高大的山门，而是在大门入口处内凹，留出一定空间以增加层次感。大门两旁各立着一只石狮，侧门的门楣分别题着“龙吟”“虎啸”的横匾，使这座尼众道场颇具威严。

进入地藏寺的大门后，依次出现的是天王殿、大雄宝殿和玉佛殿。三座大殿构成了地藏寺的中心建筑。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雄宝殿是寺院中最重要的场所，寺院各种重大的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大殿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寺题地藏，殿供释迦，如来摄一切三宝”。但在历史上，地藏寺的大雄宝殿中供奉的却是地藏菩萨，地藏寺也是因此而得名。《三山志》就记载道：“（地藏院）殿塑地藏，因名之。”地藏菩萨在汉传佛教中代表着“大愿”，那句震撼人心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便是他为救度众生而发下的的深弘誓愿。

地藏菩萨舍身度人的崇高精神，也激励了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在李敖以戊戌变法为主要背景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谭嗣同在慨然赴义前给杨仁山写了一封信，信中论及“（佛门）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自言

“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并以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自勉，决意“自度不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谭嗣同就义后，其棺柩暂置于北京法源寺。而福州地藏寺——这座供奉地藏菩萨的千年古刹——则是“戊戌六君子”中林旭的停柩之所。

人们说到林旭时，常会提及岳父沈瑜庆对他的提携。事实上，发迹前的林旭生活相当坎坷。林旭（1875～1898）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少失怙恃的他随叔父长大，住在东门外的塔头街，即魏杰置产“魏半街”之处。林旭作有一首《还家题斋壁》，生动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家境。在诗中，林旭先是描写自家庭院“海棠枝上虫，斑绿



林旭

状踉跄。笋生不择地，廊陔石尽起”的窘况，与“南邻荔支熟，高伞张红紫”形成鲜明对比。在诗的最后，“馋眼慰无俚”的林旭只得安慰自己“去年大雪寒，实小酢如李”。

由于家贫的缘故，林旭当时连读书都经常需要去向他人借阅或是在书市中翻阅。虽然年轻时的家贫给林旭留下深深的印象，但这里作为他短暂一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依然寄托了林旭浓浓的乡情。林旭生命中的最后七八年基本都是在外地度过，因此有《再题》中“畏人客子成何着，耐向闲庭数日思”的感慨。与塔头街相隔不远的地藏寺，或许也埋藏了这个青年对家乡的不少回忆。

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意志，林旭逐渐迎来命

运的转机。他先是得到沈瑜庆的赏识，与沈家大小姐沈鹊应结成良缘；又在19岁那年考中福建乡试第一名，一时声名鹊起，“闹作传诵天下”，“知名士争与交”。相比于28岁才考中举人的岳父沈瑜庆，以及直到36岁才和林旭同年中举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而言，这时的林旭可以说是风头一时无两了。

此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康有为新学的兴起，使林旭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林旭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义无反顾地投身变法图强的事业，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始终扮演最为积极的角色，被人称为“新政中之至新者”。在戊戌变法中，林旭与杨锐、谭嗣同、刘光第四人被破格提拔为军机章京，进入清代最机密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参与新政事宜。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即宣告失败，“军机四卿”从入直军机处到被捕入狱一共也不过十余天。在平均年龄约为37岁的“六君子”中，年仅24岁的林旭无疑是最令人惋惜的一位。据说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刑场上，林旭都常常挂着微笑，仿佛已勘破生死。这些记载，让人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位翩翩君子的形象。

光绪戊戌年（1898）冬，林旭的尸首在义仆朱德贵的护送下回到福州，停放在地藏寺中。对于林旭死后之事，民间流传着许多说法，比如称他是被处腰斩极刑，或者说当地的保守派曾百般阻止林旭入殓，甚至用烧红的铁钎捅穿他的棺材。这些说法恐怕大多是民间为突出其悲剧色彩的附会。而且，我相信，坐在殿堂之上的那尊舍



重修福州金鸡山地藏寺碑记

身度人的菩萨，也必定会保佑躺在棺中这位杀身成仁的君子获得死后的安宁。

三、事死事生的民间信俗

如今，地藏寺中已找不到与林旭有关的任何旧迹。在林旭死后两年，他妻子沈鹄应也因哀毁过度随他而去。翌年，沈瑜庆乞假回闽，将林旭与沈鹄应夫妇合葬于福州北门外，今已难寻其址。算起来，林旭的棺柩在地藏寺一共停了三年之久。林旭或许是历史上与这座寺院有关的人中最为知名的一位，但对于历劫千载的地藏寺来说，他也不过只是无数从这里走过生死轮回关口的福州人之一罢了。

历史上，地藏寺曾长期作为民间停柩之所。从有限的记载中来看，地藏寺在清末和民国的几次重修中，迁移停在这里的棺柩都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魏杰当时还特意立碑，“公禁不许租停棺柩，寺僧如有不遵，立即斥逐不贷”。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公禁石碑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约束效果。仅德钦尼师在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接管地藏寺时，改葬滞停于此的棺柩就达到了近百具之多。

地藏寺屡屡沦为民间停柩之所，有着其历史原因。中国古代对丧葬非常重视，有“事死如事生”的说法，对于无主的死者也尽可能让其死有所葬。地藏寺所在的金鸡山，至迟在元代就被官府开辟为义冢。据《八闽通志》和《万历福州

府志》记载：元泰定四年（1327），福州路总管刘元亨奏请设立义冢，“度四郊依山之地为圻各千，创亭其侧，以便祭享，俾邻近寺僧主之”。东郊的义冢便设在东门外易俗里金鸡山，“旧凡俗不能营葬者，悉焚尸于此”。至明成化十七年（1481），福州知府唐珣又进一步扩大元代义冢的规模，“以济孤贫不能举者”，并更名为“城东丛冢”。明初诗人王恭在《鸡公弄》一诗中，描述了当时坟冢遍地的情形：“荒岗古墓难笼边，蔓草离离生野烟。狐狸养子隐荆棘，乌鸢作巢衔纸钱。”

另一方面，从信仰环境来看，历来有“闽俗好鬼”的说法。福州东郊一带民间信仰兴盛，历史上佛、道教寺院宫观众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供奉道教主掌生死的东岳大帝，福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东岳行宫就位于这里。东岳行宫供奉着道教，被认为是福建全省“鬼王”之宫。明代《闽都记》记载：“去城五里，为东岳泰山行宫，香火甚盛。三月二十八日，州民以是日



地藏殿藻井周边画的是《西游记》故事

为岳帝生日，结社荐亡，观者如堵。”迨至清末，《闽县乡土志》还称其“顶礼之盛，殆罕匹也”。

在民间，地藏寺中供奉的地藏菩萨与东岳大帝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地藏菩萨在佛教中有着超拔众生不堕于恶道受苦的功德，民间更将他奉为地狱的主宰、幽冥世界的教主。人们希冀通过这位悲心远大、愿力深弘的菩萨，与死后的未知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消解个人对于死亡所造成的深切恐怖。那些长期将棺柩停于寺院者，大多可能都是无力将亲人下葬的人，他们或许也是希望可以借菩萨的愿力来保佑死者安宁。

停柩的问题，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德钦尼师再次回到地藏寺时，才得以真正解决。德钦嗣法于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在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曾一度入主地藏寺，采取迁葬的手段解决当时的停柩问题。后来因抗日战争期间福州沦陷，德钦率众离开，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再次回寺。此次，她易堵于疏，在后山建造化身窑，后又设置骨灰寄存塔，引导信众采取佛教提倡的火葬方式。这里后来也成为福州市最早的火葬场所之一。据说在中国古代，火葬就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兴起的，甚至在佛教兴盛的两宋时期还曾一度盛行。如今，地藏寺已不再进行火化仪式，但在寺院的往生堂中供奉着先人灵位，仍然是信众为亡者助念往生，为生者祈福延寿的一种信仰方式。

地藏菩萨现在被供奉于地藏寺右偏的地藏殿中，这也是这座庄严佛刹中最具民俗气息的殿

堂。殿外的墙壁上绘着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殿内藻井四周画的则是《西游记》的故事，两侧墙壁所嵌的十块石板上还分别雕刻有民间盛行的十殿阎王绘像。殿堂正中供奉的地藏菩萨，现比丘相，头戴毗卢冠，身披袈裟，右手持锡杖，左手持宝珠。民间又称这样的造像为“延命地藏”，认为能免夭折之灾，具有延命之德。人们哀悼死者的同时，也是在为生者祈祷。殿前的香炉中燃着几炷香，烟雾缭绕，寄托着信众虔诚的心愿。

离开地藏寺时，我突然注意到了寺院门前那两扇精致的石花窗。上面雕刻的鹿、竹、松、鹤等图案，所寓意的应该正是人们普遍祈愿的“福祿高升”与“松鹤延年”吧！这座掩身于坊巷之中的地藏寺，不仅是修行人“修抛红粉，居对青山”的场所，同时也寄托着周边百姓人家对于今生来世幸福的企盼。



精致的石窗花

象园木雕，树与根的灵性

黄锦萍

一只蝴蝶飞来，停泊在一棵粗壮的木头上，这是一棵百年黄杨木的一段，能让木雕艺人眼睛放光的原始材料。别小看这一节沾满尘埃的木料，经过雕刻师“叮叮咚咚”的敲击、雕琢、打磨，一件惊世的艺术品或许就潜伏在这截木头里。它可能幻化成生动的人物、山水、花卉，也可能被赋予飞禽、走兽、鱼虫的灵性，全靠雕刻师的喜好和心情。

走进福州温泉公园内的艺博园，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看似随意点缀的花草雕塑，曲径通幽的林荫小道，大气灵巧的庭院布局，营造出浓浓的艺术氛围。但这里最令人流连的，是艺博园园主汪方寒收藏并展示的各个朝代、各路木雕根雕大师的精品力作，真是一件比一件经典，让人目不暇接。汪方寒是福建省雕刻艺术大师，他们家是声名远扬的木根雕世家，岳父林学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妻子林秀敏是中国木雕艺术大师，展厅里摆列最多的，自然是他们家创作的获奖作

品。汪方寒正在陈列馆里指导徒弟们调整摆设木雕作品，见我到此造访便停下手里的活，带我参观他的收藏，如数家珍。他告诉我，福州象园木雕始于明末清初的建筑装饰和佛像，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一套独特完备的雕刻技法。主要材料为龙眼木、黄杨木，作品多为人物和动物。龙眼木雕作品古朴大方、粗犷别致、人物造型准确生动。黄杨木雕则风格细腻逼真，传神洗练。象园木雕作品的外貌特征，就在于它保留了木质原有的色泽和纹理，看上去显得“粗”，其实是有意追求“自然”本色，按现在的说法叫“接地气”。一件艺术品往往要经过腹稿、图纸、粗雕细琢、绑枝、塑形等烦琐的工艺流程，精细打磨之后，更显圆滑细腻、精美光润。象园流派的木雕追求人物动态逼真，讲求面部神韵，衣纹柔软，有风吹水面的波纹之感。所雕刻的动物类造型千姿百态，人物面具更是独家所有。

据《福州地方志》记载，福州的木雕技艺可

追溯到唐宋时期，1796年前后（清嘉庆年间），福州东郊象园村一带木雕艺人以茶树根和樟木的自然形状雕刻人物、走兽作品。雕刻高手的木雕作品保留木质的原有色泽和纹理，或精致细腻、或形意并存、或别致生动，具有较高的收藏和家传价值，被称为“古董”，为人们所追捧及收藏，也催生了专营木雕生意的“古董商”。当时的福州正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商人的推动下，福州木雕也由此销往世界。

清朝时，象园村艺人柯传灿、柯传钟（俗称象园柯派）以雕塑人物自然逼真闻名，他们精于木雕技艺，不仅在象园村收徒传授木雕技艺，还传艺于邻村。民国时，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在象园头开办福州工艺传习所，聘请象园派陈春润等传习师教授木雕技艺，培养了大量的木雕传人。

1936年，福建省教育厅开设雕刻科，聘请象园派名艺人柯经煊出任专职木雕教员。柯经煊的高徒有后来木雕界大师阮宝光、柯依斌、阮文瑞等。柯经煊更是盛名远播，还被请到台湾授徒。经过先辈们多年的传播与传承，在福州逐渐形成了以象园村为发祥地的三大流派：象园、大坂、雁塔，其艺术各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福州木雕迎来了鼎盛期。其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58年，福州第一木雕厂宣告成立，它的前身就是福州首个木雕合作社，地点就设在象园王庄附近。

据了解，福州第一木雕厂是福州第一家地方国营木雕厂，集结了象园地区三大流派的众多工艺家，当时职工最多达1000多人，兴盛程度可见一斑。“十年动乱”前，福建莆田、厦门和吉林长春等地曾前来请福州名师柯依斌、

林亨云、徐炳钦、阮文光等到他们的家乡传经送宝授徒。象



园地区的老艺人们在为福州木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与传播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也奠定了象园木雕艺术之乡的地位。

象园木雕流传至今，名家辈出，涌现出许多享誉海内外的艺人，清朝象园地区雕刻名家柯世仁的草虫、花卉雕刻玲珑细致，人物衣纹柔顺，表情逼真。前不久我在福建省博物院工艺美术馆参观时，还欣赏到馆藏的《伏狮罗汉》《伏虎罗汉》《弥勒佛》《观音菩萨》等精品佳作。民国初年，象园流派的代表人物柯庆元，精湛的技艺征服了业界人士，首创的木雕作品名闻海内外，不论是《划龙舟》《踏水车》，还是《太极八卦》《八仙过海》，栩栩如生的形态令人过目不忘，作品还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现代象园流派的著名木雕艺人及作品有，柯经煊的《寿山童》《达摩虎》，阮宝光的《走雨》《回娘家》，俞运斌的《拔河》《千手观音》，林友舜的《东方朔》，他们都是扬名海内外的雕刻大师级人物。

作为传统木雕的发源地，象园村一带的木雕市场曾经聚集了众多的民间艺人，“前店后作坊”的家庭经营模式盛极一时。听老象园村的老人说，以前象园村400米以外就能听见雕刻时木锤敲击雕刀的声音。整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发动起

来，声势浩大，响声连成一片。年近半百的王秋英是家里第三代木雕手艺人，13岁起就继承祖上雕刻技艺，专攻佛像类雕刻。王秋英说，那时候大大小小几百家的家庭作坊，每日敲击声不断。男人有力气，就在后院打坯；女人心细有耐性，就专做磨光上色的活儿。70后杨清说：小时候我们没有现在小孩那么多玩具，父亲随手刻的金鱼、大象、乌龟、花篮等小型木雕就是最好的玩具，几乎家家都有，大家都拿在手上玩，有时也会送给别的小朋友分享，我们都是伴随着小木雕玩具长大的一代。

说起象园派的后起之秀，足够列一串闪光的名字：阮文光、陈推坚、林学善、潘发清、郑大木、俞开明、林秀敏、叶国强、郑新一、杨羿——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都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构思奇特，大胆吸收现代雕塑艺术的精华，讲求人体结构比例，手法清新，衣纹简练等。大坂流派以人物雕刻见长，作品神形兼备，人物内心细腻丰富。而陈派雕刻的仕女脸型古典、圆润高雅、温柔多姿；仙佛表情丰富，衣纹飘动有力；武将富有气魄，盔甲花饰变化多样。雁塔流派则与漆器完美结合，擅透雕、薄雕及镶嵌，讲求布局和透视，立体感强，刀法灵利，雕镂玲珑剔透，人物雕刻刀路薄浅，衣纹平



《禅》黄金樟 林学善



《破缸救弟》 林圣如



《走雨》 阮宝光

顺，面部表情圆润丰富。这些成果，不得不让人相信，离开土地的树与根并未失去灵性。经过雕刻大师的手，通过圆雕、半圆雕、浮雕、透雕、镶嵌雕、根雕、线雕等技法，赋予朽木以重生。

中国木雕看福建，福建木雕看福州，福州木雕看象园。这是中国根雕界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2008年象园木（根）雕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象园木雕以其精湛的技艺、深沉的意蕴、明晰的流派传承，成为福州木雕的集大成者。目前，由于象园村全面拆迁，木雕师傅扩散到鼓山镇等地，正在闽侯、长乐等福州十邑地区开辟新市场，尤其在闽侯上街，形成了省内外极

具影响力的“上街木根雕展示中心”。

提起象园木雕，不得不说与木头结缘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学善。他因擅长雕刻达摩，被业界人尊称为“达摩善”。林学善由衷地说：树桩、树根原本不是艺术，但将这些“璞玉”雕琢成器，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天然而成的树桩、树根，在木雕大师的刀下，蕴含着无穷的意蕴。木雕大师总能参透木头的玄机，依照树桩、树根的天然形状，稍加“点拨”，便妙然成趣。林学善说了这样一个创作的小故事：在一座寺庙里，他捡到了一小截废弃的空心树根，只有30厘米长，却长了一块木瘤，他抹去厚厚的

泥巴，发现树根上还有一大截白皮，同行者看得直摇头，劝他不值费神，“拿去烧火”。林学善捧在手上，越看越觉得像达摩，深思之后，他在树根的正面雕了一尊达摩，淘空的树桩成了达摩面壁的岩洞，更意外的是，小木瘤成了达摩坐禅的石头，远远看去，达摩盘膝静坐，双目下视，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画像。当林学善在白皮上刻下了自己的名款时，朽木复活了。

林学善深有感触地说，若要指点自然造化，选材和刀工缺一不可。一块具有自然形态美和创作价值的木材，有时一目了然就能确定创作主题，但这种情况概率极少。一般情况是觉得木材可用，但“怎么用”就要仔细考究了。林学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解决了“怎么用”，将人们难以察觉到的隐藏在树皮底下的美挖掘出来。然而，在解决“怎么用”的过程中，刀工至关重要。在雕刻过程中，除了对木材局部作少量的修饰和必要的雕琢外，重点应放在巧妙地利用木材自身的自然形态，如枝、须、洞、节、疤、纹理、色泽、态势等，尽量将这些天然的特点充分地挖掘出来，赋予它神韵。以料

就刀，以刀就料，因材施艺，往往巧借天然，美得其所，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结合起来，实现最初的创作意图。

林学善对达摩情有独钟，或许，源自福州临海多山多雾的环境和民间禅文化的传播。他说：

“用木雕这一艺术形式来表现达摩的执着精神非常贴切，可以表现出大师的风骨。当年，达摩在石洞里悟禅时，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双眼紧闭，心无丝毫杂念，连飞鸟都不知道石洞内有人，竟在达摩的肩膀上筑起巢来。”对于达摩的钟爱，源于林学善心性的修养。或者说，积累于日常，作用于永恒，心境高则雕境妙。佛学讲求缘法、因果报应，有因必有果。林学善似乎就是遵循着佛的心境，才走上了雕艺之路。他说树与根都是有灵性的，他矢志要把老福州的传统工艺传下去，让更多人保护与传授木雕艺术。



《茉莉花开》桧木 林秀敏

枯木逢春犹再发，玩赏木雕体味艺术，就是要让枯木沐浴着思想的光芒，让思维植入木质的灵感，那种被雕刻的时光，不仅写意现实且刻画历史，是一种坚实的复活。

黄榦：朱熹理学第一传人

郑黎明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长乐青山人。少师从朱熹，后成为其女婿，并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历知新淦县、汉阳军、安庆府等，多有善政。以大理丞转承议郎终仕。卒谥文肃，赠朝奉郎。尝讲学白鹿洞书院，生徒广众。提举湖南学政时，奏请朝廷，以公帑易茶陵田350亩为石鼓书院学田，给养诸生。一生著述颇丰，可考的专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诲鉴衙》《朱子行状》等。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使得黄榦以传承理学作为己任，文章、道德、气节成为他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矢志不渝传承流布朱熹思想，使蕴含其中的求理、求实、忧患、力行、道德、开放等充满生命智慧的学术精神，根深蒂固地嵌入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

候师三月

淳熙二年（1175）冬，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村，大雪。

23岁的黄榦已经在这里的客栈盘桓数日了。他要等待的人就是当时已名闻遐迩的大儒朱熹，可这位先生神龙见首不见尾，始终不见踪影。黄榦决定一直等下去，直至见到他。

几个月前，他跟着为官的二哥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向庐陵名士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一见黄榦，认为他是对道学悟性很强的非常之人，怕误人子弟，极力建议他回福建向自己的老师朱熹求学，并修推荐书一封带给朱熹。

黄榦一路跋涉，迎风戴雪，满面尘霜，来到朱熹在五夫村的住处，可朱熹刚回婺源祭扫祖墓，不知何时归来。为了等待朱熹，住在客栈的黄榦，晚上睡觉连衣服都不敢脱，就等随时被朱熹召见。这样的日子一等就是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了，朱熹才施施然归来。

当年，也是这样的鹅毛大雪天，两个福建同乡杨时和游酢去向程颐求教。凑巧赶上程颐在屋中打盹，于是两人只好静立门口，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

朱熹对他的祖师们的励志故事当然了如指掌。看到这个年轻人，居然虔诚地在这里等候三个月，颇为赞许。

志向远大的黄榦十分珍惜在朱熹门下求学的

机会，不浪费一分一秒读书和做学问。《宋史·黄榦传》记载：“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朱熹对这位高徒甚为器重。朱熹在写给刘公度的信中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为了开阔黄榦的眼界，朱熹还叫他到吕祖谦那里请教，又叫他读张栻写的书，对当时鼎足而立的朱、吕、张三家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

淳熙六年（1179），长兄黄杲卒，黄榦回福州治丧。第二年依旧未归，这使得朱熹十分沮丧，他在回复黄榦的信中感叹道：“吾道益孤，朋友难得……所望于贤者不轻。”自己“老病无聊，益厌俯仰，但思归卧山林与如直卿者一二人相与讲论，以终素业”。这表明朱熹与黄榦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仅仅是师生的关系，已经上升到知己至交了。

后来黄榦回忆他当初师从朱熹的情景时说：“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

林垆，或谈笑布春容，或切至而叮咛。”师生情深，溢于言表。

许多人认为黄榦“候师三月”的故事，比起“程门立雪”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联赞道：

伊川府前立雪一尺，世皆尊程氏高弟称
游杨载道南矣；

紫阳户外候师三月，吾独赞朱子门人号
颜曾续统北焉。

葱汤麦饭两相宜

淳熙九年（1182），黄榦31岁，在朱熹门下已有八年之久了。这个大龄青年，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他看来，“学问无穷，不可以轻儇浮浅得也”。朱熹每“语之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领悟”。黄榦这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品行和意纯志坚、刻苦求知的决心最终打动



位于福州北峰的黄榦墓

了朱熹，他欣然将自己最怜爱的四女朱兑嫁给了黄榦。

当时的朱熹声名显赫，“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婚”，而他偏偏看中无甚背景、家境清贫的黄榦，正是看中黄榦一心向道、志坚思苦、励志为儒的才智。选择黄榦为婿，实际上是选择学术和事业的继承人。

两年后，黄榦有了第一个儿子黄辂。为了追求更高的道学理想，身为人父的黄榦难以顾及生计，生活日渐拮据，却依然不改其志。好友梅羽曾到他家中拜访，见其“家徒四壁，日特蔬食以对”，但“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

有一年盛夏，朱熹前来看望黄榦一家。女儿想好好款待老父亲，但因家境贫困，实在端不出什么像样的菜肴。无奈之下，女儿只好跑到屋后的菜园里摘了几根香葱做成清汤，然后又煮了一锅麦饭。

朱兑从厨房端出葱汤麦饭时，面有难色、神情尴尬。深知女儿家里窘境的朱熹丝毫没有责怪，反而安慰道：“俭朴度日，是我们家的好家风。这样的饭菜已经不错了，吃起来不仅喷香可口，足以饱食，而且还能滋补身体，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临别之际，朱熹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莫道此中滋味少，前村还有未炊时。

岳父的这首题诗，黄榦恭恭敬敬地贴在壁间，当作座右铭以及家训。黄榦还在墙壁边

上自题诗曰：“愚夫饱欲死，志士常苦饥。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足见其安贫乐道之风。

道付沧州继绝学

南宋嘉定十年（1217），黄榦知安庆。金人在安徽北部的光州一带连连起事，安庆军的首府在潜山，距光州不远，而且又无屏障，极易被攻陷。迁城之事，迫在眉睫。

黄榦一边以“金人破光州”为由请示朝廷迁城，一边带文武官员赶到长江边考察新城地址。整个筑城过程，动员了官兵百姓近万人，耗时250余天，最辛苦的就是知府黄榦。安庆城建成后两年，金兵破周边的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而唯独安庆安然无恙。继而夏季江水泛滥，洪涝一个多月，安庆城仍屹然无虞。

黄榦选择安庆造城，他的智慧和实干开创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使之有了“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美誉及“八省通津”的美称，后来还一度成为安徽的首府。如今，这个黄梅戏之乡，以一出常演不衰的经典黄梅戏《知府黄榦》，来永恒怀念这个爱民尽职的地方官。

黄榦在仕途顺畅、名声日长之时，选择急流勇退，辞官归居。田园将芜，胡不归？他的更大的使命还未完成，他始终忘不了朱子的临终嘱托。当年，朱熹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制服及所写的书都托付给黄榦，并手书诀别语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回归故里后，黄榦责无旁贷担当起“领袖朱门”的责任，学生日益增加，巴蜀、江浙、荆湖之士都纷纷前来求学。编辑礼仪，著写书籍，与弟子们讲论经典，论说理义，勤勉不倦，朝夕往来，质疑问难，请求教益，像朱熹讲学的时候一样。

公元1220年，在朱子去世的20年后，黄榦几经反复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了却了他的最大的心愿。次年三月，黄榦溘然离去，他已经没有遗憾了。当时，为之送行的“门人弟子执紼者二百余人，皆衰经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

后人评论朱熹门人弟子聪明卓越固不少，然求其始终不渝、老而弥笃者，唯黄榦也。范寿康在《中国哲学史通论》中，称黄榦“是一个有骨有肉的学者”。

作为朱熹的门人、女婿，黄榦从学朱熹前后达25年之久，随侍左右，在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朱熹逝世后，为朱子学的普及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从而确立了朱熹“道统”的地位。

经过黄榦的发幽阐微，朱子学最终冲破“伪学”的禁锢，成为南宋之后的正统思想。从此，朱熹对于儒学的解析被认为是儒学的正宗解释，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它占据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至元代，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尊

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师，以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为理学传承的正统世系。

明末清初，由黄榦整理编辑的朱子著作，还经传教士漂洋过海，得以在欧洲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公元1700年左右，一位叫作白晋的法国传教士，送给他的德国朋友莱布尼茨一件礼物。这是一本朱熹的著作《周易本义》，里面的数张“易图”，引起了这位绰号Lovenix，即什么也不信的人的浓厚兴趣。莱布尼茨在伏羲八卦图里，左思右想，最终悟出了二进制数之真谛。钦佩激动之余，莱布尼茨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他称赞康熙尊崇儒学，导倡程朱，是最具有理性的皇帝，要求加入中国籍。

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宋儒思想的“理”与基督教的“上帝”简直就是同一个概念，这个“理”超越了智慧，是一种超智慧。他也正是从中国理学家的智慧中，受到启发，系统地提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为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莱布尼茨的传入，通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先贤的启蒙，朱子理学思想被有机地融入现代文明中，焕发生机和活力。黄榦传扬朱子理学，功不可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学之树常青，历史给予黄榦——朱子理学第一传人的褒奖，他是当之无愧的。

黄榦，安庆的“城市之父”

张健初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安徽省安庆市，不是一座简单的城——中国城池无数，但修筑城池过程被记入二十四史的不多，安庆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安庆筑城过程载入史册，并非因为城，而是因为人，他就是时任安庆知府的黄榦。

800年前，南宋嘉定十年（1217）四月，安庆知府黄榦由潜山顺皖河而下，在盛唐湾宣城渡下了船。黄榦是带着一脸忧虑匆匆来盛唐湾考察安庆府新址的。此时，金人在光州一带连连起事，潜山距此不远，人心惶恐，迁城之事，迫在眉睫。当时交通不发达，上报朝廷的奏折，需经千里古栈道快马送达，知府黄榦一边“以金人破光州”为由请示朝廷，一边带文武官员赶来安庆考察新城地址。

安庆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如果在长江武汉至南京段取一中间点，这个点，便是安庆；把范



安庆城东枞阳门，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

围缩小，在九江至芜湖段取一个点，这个点还是安庆。800里皖江由宿松小孤山进入，至马鞍山采石矶流出，将其一分为二的河流，恰恰又是安庆城西的皖河。再细一些，皖水由潜山而下至城西石门湖，枞阳河流经桐城汇城东菜子湖，两者



安庆老照片



安庆城南康济门，民间俗称小南门

一东一西流入长江，安庆城也正好居于其中。

由宣城渡拾级上来，立于盛唐山顶，抬头北望，龙山苍苍，风水弥弥。回首远眺长江，风帆沙鸟，紫烟万叠。从地理形势上看，安庆是大龙山伸向长江的一条余脉，它南临长江，东西环水。早有取处，涝有退地。战则能攻，防亦可

守。黄榦不由捻须而笑，想起东晋郭璞一句“此地宜城”吉语。郭璞精通阴阳历算，早在几百年前，就为安庆谋划好了城池草图。

黄榦为理学家朱熹四大弟子之一，“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赞赏之余，朱熹索性把女儿嫁给了她。自然，黄榦也没有辜负老师的一



安庆“黄榦筑城”浮雕局部

片心意，他做出的成绩，最后载于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作为“朱氏门人”入选《宋史》的黄榦，传记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筑安庆新城。

黄榦到盛唐山进行了翔实考察，最终圈定以盛唐山为中心，向北，向东，向西，利用起伏丘陵地势，依山而建城墙。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借山体的斜度与高度，或在外侧垒砌城墙，或山顶加筑城墙，达到省时、省工、省料的目的。

新筑城池是要报朝廷批准的。此时南宋的京城在哪呢？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于是连夜把奏折写好，又连夜派人马不停蹄送往临安。但此时，金人南侵的消息不断飞入黄榦耳朵，且离安庆越来越近。虽安庆与临安相隔不是太远，但一来一回，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可能的，于是，黄榦当即立断，不等朝廷批复，先动手干起来。先斩后奏与丢失城池，两者相比，后者的罪责更大。

安庆城正式动工修筑，时间是南宋嘉定十年四月，按公历计，是1217年5月中旬。此时安庆的天气已经有一些热，参与筑城的民工，基本上都是赤膊着上身在干活，这之中，也包括黄榦本人。

黄榦做官如做学问，筑城也如做学问，他将工程分为12料（段），“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既然自己有经验在先，手下若有欺瞒、偷减、拖延之举，也就逃不过他的眼睛了。据《宋史》，整个筑城过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役

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其工程之大，工程之艰苦，可以想见。而知府黄榦，筑城过程中，每日“五鼓坐于堂”，先处理每日筑城的具体事务，包括“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等等。之后才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白日里，他基本都在四处巡城视役，到晚上，几乎一夜不隔，天天去书院讲论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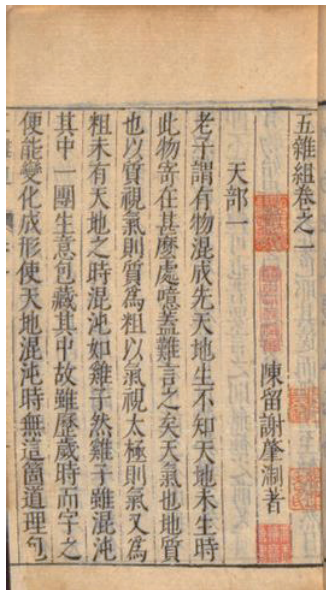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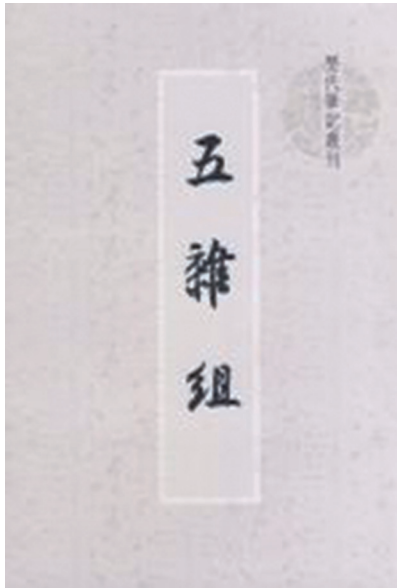
筑城期间，最忙最累也最苦的，当然还是知府黄榦本人，他有这么多的事要做：安庆府的大事小事，他必须管；有人到衙门敲鼓打官司，他必须受理；上面来人下面来人，该他出面的还要出面；夏秋两季，病害易发，还要与僚佐讨论防治之策；筑城进展如何，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这也少不了他。最关键的，再忙再累，也不能松懈教育，所以，晚间稍有空闲，还要去书院讲论经史。就这样，前前后后大干了8个月，从当年四月筑第一块城砖开始，到腊月尾最后一段城堞完工，前后耗时250余天，到1218年春节的时候，整个修筑基本完工，安庆城自此正式出现在中国版图之上。

安庆筑城过程被载入史册，黄榦，也被安庆人尊为“城市之父”。如今，在安庆江边的文化墙上，黄榦筑城的雕塑，向后人们叙说着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

谢肇淛与《五杂俎》

余 臻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长乐人，号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等。明隆庆元年（1567），谢肇淛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父谢汝韶，举人出身，曾任钱塘教谕、安仁知县。谢肇淛自幼颖悟聪敏，稍长即博览群书，擅长诗文。明万历六年（1578），谢汝韶辞官回福州，谢肇淛随父居福州朱紫坊，其间与当地名士徐燧、徐爌、曹学佺等人多有交游，组织“莲社”，切磋诗文，学识精进。万历十六年（1588）谢肇淛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此后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其间曾上疏指责宦官遇旱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天启元年（1621），谢肇淛任广西按察使，官至广西右布政使。



《五杂俎》

谢肇淛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等地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格调雄迈苍凉，抒情写实，诗文成就甚高，是明代晚期福建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谢肇淛博学多才，勤于著述，著作有《麈史》4卷，《麈余》4卷，《居东杂纂》2卷，《文海披沙》8卷，《五杂俎》16卷，

《百粤风土记》1卷，《北河纪略》8卷，《北河纪余》4卷，《谢在杭文集》28卷，《诗集》30卷，《滇略》10卷，《泊堂台墨》12卷，《小草斋诗话》4卷，《小草斋集》30卷等。万历三十四年（1606），其父谢汝韶去世，谢肇淛回闽守孝三年。加上明万历六年（1578）至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前的十余年，谢肇淛在福建生活的时间较长，使他对故乡的历史人文和风土人情有很深的了解。在闽期间，谢肇淛编修了多种福建地方志，如《万历永福县志》5卷，《方广岩志》4卷，《晋安艺文志》3卷，《长溪琐语》1卷，《太姥山志》3卷，《鼓山志》12卷，《支提山志》7卷等。此外，他曾与徐重刻淳熙熺三山志》等志书。谢

肇淛主张方志应“取材于陈编，定体于往哲，宁质无华，宁核无舛”，其方志学观点至今仍对修志有借鉴意义。在京为官时，谢肇淛常到内府抄阅古籍收藏，酷嗜藏书，收集宋人文集颇富，秘本较多，贮于“小草斋”中，藏书名耀东南，与徐、曹学佺并熺当时福建藏书“鼎足三家”。曾有家藏数目为《小草斋书目》，今已不详。此外，谢肇淛还撰写大量杂记，但凡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学、科技、动植物等无不涉及，但其著述的主要成就在于方志学和博物学方面，所著《五杂俎》为明代有较大影响的一部博物学著作。

《五杂俎》或作《五杂组》，是一部笔记类著作，全书共16卷，分类记事。分别有天部2卷、地部2卷、人部4卷、物部4卷、事部4卷。因全书由五部组成，故名《五杂俎》。该书大多记录了作者的读书心得和事理分析，同时记载了政局时事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亦有国事、史事之考证。《五杂俎》问世至今，已多次刊刻出版。最早的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如韦馆本《五杂俎》刻本，即如韦馆本，半叶9行，每



谢肇淛墓

行18字。全书共五册，该刻本前有李维楨的《五杂俎序》。《五杂俎》在清乾隆年间文字狱最盛之时曾被列为禁书，全国收缴并“全毁”，其主要原因是该书言辞大胆且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即关于“夷夏”的议论。谢肇淛学贯古今，对历史和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明朝尚且强盛的时候，就看到了边疆最大的隐患——正悄然发展起来的“蛮夷之族”女真。因此早在万历年间，谢肇淛就在《五杂俎》中提出了制服夷狄的策略，这就成为后来被禁的原因吧。

《五杂俎》在许多地方生动描述了福建的乡土风情，这也成为后人考证福建地方历史风俗的重要资料。如在卷一《天部》中，谢肇淛笔下涉及福建的论述就多达8条，基本上都是谈论闽地的年节风俗。其如“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为之添丁”，“至于（端午）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卷四《地部》涉及福建的论述也有6条，如在谈论温泉时说：“至吾闽中则多矣，吾郡城内外，温泉共十五处，而其一在汤门外，最小而极热，土人呼为‘杀狗泉’，盖盗狗者常于此治之也。”

明天启四年（1624），谢肇淛病逝，归葬于祖籍地长乐营前镇下洋村大象山。其墓占地近200平方米，坐东向西，背倚大象山，面向闽江，前有溪水萦绕，可谓风水宝地。墓埕地面为三合土和石板铺筑，封土夯筑。封土前有祭台，台上建碑亭，内立墓碑，碑文“大方伯谢公佳城，崇祯丁丑岁，季秋吉旦立”，标明为明崇祯十年（1637）修建。谢肇淛墓现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十几年前作者曾到现场考察，发现除了部分墓圈石构件有损坏外，其余保存完好。清咸丰五年（1855），福建盐商魏杰在鼓山建桃岩精舍，内祀五贤，即曹学佺、徐燠、徐、林弘衍、谢肇淛五位名士，故名五贤祠，后燠多往瞻仰。



鼓山五贤祠

陈太尉宫：信仰的坐标

郑秀杰

一条小路蜿蜒向上，两边杂草丛生，偶尔有云雀从稀稀拉拉的杂草间飞出，不远不近地落在一棵枫树尖上，鸟声如哨，在云空久久回荡。向前迈进，眼前豁然开朗，黄土丘上的四周挺立着许多小青松，棵棵气势昂扬。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阔叶树，经几阵秋风秋雨后，残存不多的绿色，逐渐被岁月披上一身金黄。

位于罗源县中房镇曹湾村的陈太尉宫，就坐落在这个小山坳里，在千百年来的风雨中，迎送香客来往，见证香火长在。

黄昏的细雨沾湿了碧野长天。站在以质朴见奇的陈太尉宫门前，虽没有双狮镇守的威严，却平添了几分亲切。山门的建筑颇奇特，殿内宝塔般层层叠加的拱斗，雕花精美，熨金烫碧，可窥宋代建筑之绚丽。早年的山门上有两副楹联，经历代风雨浸蚀，朱漆斑驳，但经细辨，字迹依稀。其书云：神殿重修永镇河川崇祀典，虬松倒

插长标斗里显威灵。

年少时，我就听说过“虬松倒插”的故事，但对于其间的情节却已模糊，这次故地重游，倒是很想问个究竟。恰有一农人于薯地上收获。问之，待吸足烟草，故事便在一炷袅袅上升的呛人烟雾中流泻，曰：后唐时，河南光州有一贡士陈苏，为人品性豪爽，志行清高，耻与权贵为伍，朝廷屡次起用，坚不受命。昭宗龙纪元年（889），由于秦宗权变乱，苏不远千里避乱迁家于罗源丰上里（今中房镇辖境）。新来不久，极慕该地民风淳朴，环境幽雅，遂有久居之意。于是自取松苗二株，倒置种植于矜滨山上，种罢，默祷说：“此松倒栽，如能成长，吾家决心定居于此。”不久，松苗果然成活，陈苏一家便定居下来。

据《罗源县地名录》记载：“其生前手植的倒插松，至清道光间已经900余年，仍然挺立山

峰，世代长青，后人即以其树命名其村，借以永志千秋。”而今的乾溪村，曾叫“倒插松”也就不足为奇了。

跨进山门，便是戏台，是乡人每年清明演社戏的地方，我小时候曾也凑过几次热闹。是日，人山人海，周遭的荒地成了临时易货点，或杂物，或水果，买卖声浪此起彼伏，此景虽无鲁迅《社戏》里的开阔，但也颇为壮观。戏台下老者居多，完全痴迷于戏剧情节。着绿穿红的年轻男女，则在宫左宫右尽情地聊着私密情话，偶有

“咯咯”笑声，招来几束愤怒眼光。此时，但凡女的，便只有垂下长发遮掩羞红的脸庞，可男的却一头昂扬，尽显春风得意。倒是旁来的眼光便知趣地收回，又投向戏台上，感受那端庄或诙谐的民间艺术氛围。

好多年来，这里就不演社戏了，非乡人忙于发展经济而忘了庆典。省里几次来人考查，认为此宫殿是研究宋代建筑在江南的唯一珍贵实物，不忍香火焚之，198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宫殿被保护



陈太尉宫

起来，但当地人对陈太尉的信仰丝毫不减。陈太尉公那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值得永远敬仰与推崇，成为古老乡间一支永远的传颂的赞歌，千百年来，一直在河阳流域一带成为千古美谈，并缓缓地流向远方。

据守护庙堂的老翁介绍：陈太尉原名陈庆，乃陈苏第15世孙，其自小聪明伶俐，胸怀大志。幼时，为练习马术，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偷偷骑上外祖父的白马，扬鞭飞驰千里，直到天晓返回，其外公念其胆略，不但不怪，还赠马于他。从此，陈庆每日骑马习武，直至18岁从军，为平定番乱立下了不少战功。

惜英雄年少，18岁的陈庆战死沙场，后被朝廷敕封太尉。据清道光《新修罗源县志》记载：“陈太尉者，年十八，身辄凌空冲举，一息数千里。后以收番封‘太尉’，歿亦为神。乡人塑像于英惠王旁，像首忽西向，若内顾焉。”他想看的不止是乡野四起的炊烟吧，也许还有朝朝暮暮的云霞。在彘突狼奔的岁月里，曾忠诚于他的北方的将士，如今依然夜梦飞掠三千里吧？当关外的风吹痛游子的乡心，硝烟散尽，英雄魂返故乡，依然借助人间的烟酒，笑望不断更迭的人事，以及姗姗来迟的历史！

据说，陈太尉真身塑像在“文革”期间“破除迷信”风潮席卷下，被敲成碎片，幸有信徒悄悄地把其骨头收藏，到1988年重塑金身时才拿出……居于右殿正中金身的那樽就是陈太尉的真身骨肉所塑。

绕过配殿，即是大殿，其中端坐着两米多高的英贤侯王及其夫人，系陈太尉祖先，乃中房曹湾居人氏。其中陈苏像，长须，圆目，冠顶明珠，紫袍玉带，威风凛凛，目光和善。

据《康熙罗源县志》记载：“唐陈苏原光州固始人。龙纪初擢贡士，才瞻行著。梁帝时屡召不起，避乱卜居新丰，创崇寿寺，舍田山三百三十亩。为国焚修建乡校，集著艾，行乡饮礼，劝民业。年八十有五无疾而逝。乡人立‘高行先生’祠祀之，屡显灵异，雨暘疾病，祈祷皆应。闽王节度长乐，郡人疫疠死者过半，神现身，救以神水，无不立苏。王怪问，自称‘高行先生’，忽莫知所往。开平时，封‘加持公’，立庙旌表于新丰。天福三年大旱，有司诣祠祈祷，膏雨沛作。至宝祐时，封‘显祐嘉应侯’，复封‘英惠王’。”

南宋嘉熙三年（1239），朝廷加封陈苏“显佑嘉应侯王”，即建宫殿于祠前，同年，其孙陈庆亦被追封为“都统伏魔太尉”，配享于宫。其后，宫改称为“陈太尉宫”。经历代扩（重）建，宫内占地面积达1155平方米，现存建筑包括正殿、配殿、前殿三部分，皆重檐歇山式屋顶。一宫之内宋、元、明、清建筑风格并存。2015年，国家拨款400多万元，对该宫进行保护性修缮，并于同年底完工，使得这一南方建筑瑰宝，得以重现光彩。

夜幕降临，离开陈太尉宫时，外面已黑成一片，远近的灯火如萤似星，显示着世间的灵气。